

清朝宮廷道士婁近垣的交遊網絡*

高麗娟**

婁近垣是清朝最著名的宮廷道士之一，他出身江南松江府、後入江西龍虎山修道，於雍正五年(1727)以龍虎山法官的身份入京值季，由於為雍正皇帝禮斗治病而獲得信任。歷雍乾兩朝，婁近垣先後任內廷欽安殿住持、京師大光明殿和東嶽廟住持，為皇帝和宗室舉辦齋醮道場，並掌管道錄司印務事。

婁近垣在京城活動近五十年，除了舉辦道教科儀，他還有自己的世俗生活。婁近垣作為一名宮廷道士，他的交遊人員中有的親王、郡王等宗室成員，有的是一、二品的當朝官員，他們身份特殊、官位顯赫，同時，這些人員之間又有師生、姻親、同僚或同鄉等關係，他們構成了一張錯綜複雜的社交網絡。除此之外，婁近垣還與內官太監有密切往來，這也是他交際圈子裡的重要組成部分。本文主要考察了與婁近垣交往的宗室成員、江南京官和內官太監三個群體，以此了解婁近垣作為一名清朝宮廷道士的交遊網絡和世俗生活。

關鍵詞：宮廷道士 婁近垣 江南京官 太監道士

* 本文為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課題「清代江南地方社會中的斗姆信仰研究」(2021EZX001)之階段性研究成果。

** 復旦大學哲學系博士後研究員。
通訊地址：上海市楊浦區邯鄲路 220 號復旦大學哲學系。
Email：gaolijuan@fudan.edu.cn

清朝皇室一直有薩滿教信仰傳統，又由於地緣關係受到藏蒙地區喇嘛教的影響，但目前也有很多研究表明，清朝宮廷內部同樣舉辦了頻繁的道教科儀。韓書瑞(Susan Naquin)和高萬桑(Vincent Goossaert)已經對清朝紫禁城內的道教建築和宮廷道場做了概括而全面的介紹，他們還依據宮廷檔案列舉了當時宮廷內部相當數量的道教場所以及由宮廷道士、當地道士和太監道士共同舉辦的宮廷道場。¹紫禁城內的欽安殿和天穹寶殿都是舉辦齋醮活動的重要場所，而所謂的「宮廷道士」指的是居住在京師、專門為宮廷和皇室提供道教科儀服務的道士，他們主要來自江西龍虎山和江南地區。

元明以來，以張天師為主導的江西龍虎山正一派道教與皇室維持了良好的關係，張天師一直擁有較高的爵秩和封號，並且可以定期入覲朝拜。²張天師入京謁見皇帝通常會奉旨舉辦齋醮道場，除此之外，也會有其他的龍虎山道士常駐京師為皇帝和宗室提供道教科儀服務，比較著名的如元朝的玄教宗師張留孫(1248-1321)、明朝的周思得(1359-1451)和邵元節(1459-1539)都是龍虎山道士，而本文要討論的婁近垣也是一位來自江西龍虎山的道士。

清朝時期龍虎山道士留宮供事的制度始於康熙年間，康熙十九年(1680)龍虎山第五十四代天師張繼宗入京謁見，當時有人覬覦奪取大真人印，康熙皇帝命張繼宗與覬覦者分壇禱雨以辨優劣，張繼宗祈禱有應，而覬覦者言之不應，這使得張繼宗獲得了康熙的信賴，並且康熙命隨覬法員吳士行等三人留京供事，給予廩餼和往返驛馬，留京法員每三年一易，由此開始了龍虎山法員留京值季的制度。³婁近垣最開始就是作為值季法員的身份由龍虎山入京，從而開啟了他在京師這個政治權力中心地帶的生活。

¹ Susan Naquin, *Peking: Temples and the City Life, 1400-1900* (Berkeley: University California Press, 2000), 303-311; Vincent Goossaert, "The Taoists of Peking, 1800-1949: A Society History of Urban Clerics," (Cambridge: MA. 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188-199.

² 王見川已經考察過龍虎山張天師與元、明、清三代皇帝的關係。王見川，〈張天師之研究——以龍虎山一系為考察中心〉，收入《道教·信仰·民俗專輯》(臺北：博揚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15)第1冊，頁73-105。

³ 劉錦藻撰，《清朝續文獻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據民國景十通本影印，2000)，卷89，頁8493b。

作為一名承雍乾兩朝寵渥的宮廷道士，地方志中有不少對婁近垣的記載，如《乾隆婁縣志》、《嘉慶松江府志》、《道光貴溪縣志》、《江陰縣志》、《光緒嘉興府志》、《重輯楓涇小志》和《嘉善縣志》等，目前關於婁近垣的研究多取材於此。

當代學術史上所見的研究婁近垣及其相關作品、科儀等的研究論文最早見於八十年代初期故宮及文物研究專家朱家潛先生的〈《黃籙科儀》提要〉，《黃籙科儀》即婁近垣整理的《清微黃籙大齋科儀》，正如標題所示，朱先生此文主要著力於介紹《黃籙科儀》，他在文末補充了簡短的婁近垣生平材料。⁴後來陳雯宜的〈談妙正真人婁近垣——由清世宗的知遇至高宗的優禮〉一文側重於婁近垣入京值季之後的際遇，涉及他為雍正祈禳治病、參與雍正開辦的「法會」、重修大上清宮、乾隆覃恩和他與王公大臣交往等情況。這篇文章概括性地描述了婁近垣入京之後由清世宗至高宗時期的禮遇，也引用了如《雍正起居注》、《宮中檔雍正朝奏摺》、《清高宗實錄》和《清史稿》等重要的歷史文獻資料。⁵孔祥毓的〈妙正真人婁近垣的生平著作及思想〉和由申的〈清代道士婁近垣及其主要思想〉也都較多地描述了婁近垣的生平，從婁近垣的姓氏名諱、籍貫師承，到入京值季都有著墨，這兩篇文章使用的材料主要是婁近垣重修十六卷本《龍虎山志》。⁶對婁近垣生平的論述最為詳盡的應屬羅文華的〈清代高道婁近垣事跡考述〉一文，這篇文章廣泛地使用了除《龍虎山志》之外的其他材料，而且逐條對比這些材料，在相互矛盾的地方做出詳細考證。⁷

⁴ 朱家潛，〈《黃籙科儀》提要〉，《道協會刊》，第6期(北京，1980.11)，頁47-49。

⁵ 陳雯宜，〈談妙正真人婁近垣——由清世宗的知遇至高宗的優禮〉，《道教學探索》，第7號(臺南，1993.12)，頁304-310。

⁶ 孔祥毓，〈妙正真人婁近垣的生平著作及思想〉，《中國道教》，第3期(北京，2006.06)，頁52-53。由申，〈清代道士婁近垣及其主要思想〉，《弘道》，第3期(香港，2012.09)，頁67-68。

⁷ 比如在不同的歷史材料中，婁近垣的字號、籍貫記載有出入，其他文章只是揀擇取用，而羅氏則廣泛地比對江西、江蘇和浙江等地的地方志，確定了較為可信的婁氏姓名、字號和籍貫。另外他對史料的解讀也比較細緻，比如通過婁近垣所在的大光明殿的日常用度推測其運營情況，以及婁近垣與文人交往的事跡等。羅文華，〈清代高道婁近垣事跡考述〉，收入沈衛榮、謝繼勝主編，《賢者新宴——王堯先生八秩華誕藏學論文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0)，頁307-313。

另外還有一些婁近垣與龍虎山正一道派的研究，比如王卡討論過婁近垣時期雍正皇帝對龍虎山的優崇，⁸以及細谷良夫和高萬桑對婁近垣與正一真人關係的研究。細谷良夫在〈雍正朝的正一教——以法官婁近垣為中心〉一文中認為，受到雍正寵信的婁近垣參與了龍虎山署理真人位的爭奪，婁近垣和真人府之間存在著內部鬥爭。⁹高萬桑也認為，隨著婁近垣地位日益顯赫與張天師的爵秩降級，婁近垣成為龍虎山的實際領導者(effective leadership)，其中一個表現就是他創立了一個新的道派(create a new lineage)，甚至整個龍虎山法官都成為婁近垣法裔。¹⁰也就是說，婁近垣得到雍正帝寵信之後在龍虎山的權限增大，他和正一真人在龍虎山的管理權方面存在張力。實際上，婁近垣與龍虎山正一真人之間的權力張力也是他入京值季之後影響力擴大的體現。婁近垣在京師這個政治權力中心生活，以道士身份接觸到王朝最高權力統治者和諸多皇親國戚，他有著廣泛的社交網絡，交遊人群從王公貴族、當朝官員到文人墨客、內官太監，他廣泛的社交網絡與他在當時的影響力互為表裡。這也是在過往研究中尚未被充分挖掘的內容，因此，我們首先在過往研究的基礎上簡要敘述婁近垣的生平，然後將重點聚焦在他的交遊網絡，希望在關注宮廷道士從事道教活動之餘，也關注到他的世俗生活，從而可以建構出一個更豐富、立體的人物形象。

一、婁近垣的生平簡述

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十月十二日，婁近垣出生於江蘇省松江府婁縣的一個江南小鎮，鎮名楓涇(今屬上海市金山區)。婁近垣於少年時期步入道門，

⁸ 王卡，〈清代天師道概述〉，《正一道教研究》，第2輯(上海，2013.10)，頁14-20。

⁹ 細谷良夫著，張澤洪譯，〈雍正朝的正一教——以法官婁近垣為中心〉，《宗教學研究》，第Z1期(成都，1994.09)，頁17-18。細谷良夫，〈乾隆朝的正一教——正一真人的降格事件をめぐって〉，收入秋月觀暎編，《道教と宗教文化》(東京：平河出版社，1987)，頁571-588。

¹⁰ “Symbolically at least, the whole Longhu shan clergy became Lou’s own disciples.” Vincent Goossaert, “Bureaucratic Charisma: The Zhang Heavenly Master Institution and Court Taoist in Late-Qing China,” *Asia Major*, no.3(2004): 145-146.

跟隨楓涇鎮仁濟觀(或稱為「仁濟道院」)的楊純一修道。¹¹成年之後,他離開仁濟道院前往江西龍虎山,繼續拜師學法。¹²雍正五年(1727),五十五代天師張錫麟按例入覲請封,婁近垣作為上清宮法員偕行,然而張錫麟行至杭州時不幸病重羽化,臨終囑咐婁近垣「善事天子」。¹³

入京之後,婁近垣作為龍虎山法官留京值季為皇帝和宗族舉行道教儀式。雍正八年(1730)三月,清世宗雍正患病,婁近垣受命為雍正設壇禮斗祛邪,效果頗有靈驗,由此獲得了雍正的信任。¹⁴雍正特意下旨讚賞他「一片忠悃,深屬可嘉」,將之與元朝的張留孫和明朝的邵元節相提並論,賜婁近垣四品龍虎山提點並任紫禁城內廷欽安殿住持,還賜帑銀十萬兩重修了龍虎山大上清宮。¹⁵雍正十一年(1733),雍正又諭旨將京師大光明殿賜給婁近垣作子孫常住,並敕封他為「妙正真人」,令嗣後每年應辦道場均令大光明殿道眾辦

¹¹ 曹相駿纂,許光墉增纂,《重輯楓涇小志》,據光緒十七年鉛印本影印,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成都:巴蜀書社聯合出版,1991)第2冊,卷6,頁106a。

¹² 婁近垣重輯,惠遠謨校,《龍虎山志》(上海:上海圖書館藏,乾隆五年首刊本,編號「線普長367928-33」),卷7,頁30a。婁近垣重輯的十六卷本《龍虎山志》首次刊刻於乾隆五年,上海圖書館的這一藏本在卷八中包含了「乾隆六年」的內容,說明這是之後增補的,儘管如此,這仍然是最接近乾隆五年婁近垣重輯的《龍虎山志》版本,而目前搜集到的其他十六卷本大多為舒運本道光十二年增補本,所以在引用婁近垣的生平資料和朝廷賜封等內容時還是使用了上海圖書館的這一藏本,以下未特別註明的《龍虎山志》(乾隆五年首刊本)均是這一版本。

¹³ 「雍正五年(五十五代錫麟,筆者註)例應入覲,命法員婁近垣偕行,至杭州病亟。囑近垣曰:『吾無以報國家厚恩,子忠誠篤實,其體予志以善事天子。』」婁近垣重輯,惠遠謨校,《龍虎山志》(乾隆五年首刊本),卷6,頁42a-b。

¹⁴ 雍正八年(1730)三月,清世宗雍正患病,時發寒熱,飲食不安,夜間難以熟寢。時任浙江總督李衛舉薦河南人賈士芳為雍正調治療病,經賈士芳調治療病之後,雍正病情好轉。但十月,雍正卻以賈士芳「心志奸回,言語妄誕」為由忽然下令將其誅殺。之後又命婁近垣為其設壇禮斗祛邪。參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清代起居注冊·雍正朝》(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第1冊,頁518-528。《世宗憲皇帝實錄(二)》,收入《清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第8冊,卷98,頁309b-310b;卷99,頁312。很多文章都討論過雍正朝時期的賈士芳事件,學者大多認為雍正多疑、好猜忌,賈士芳所謂的「天地聽我主持,鬼神供我驅使」不過是道教科儀中常見的法術咒語,然天威難測,最終橫生禍端。楊啟樵,《雍正帝及其密摺制度研究》(香港:三聯書店,1985),頁272-275。

¹⁵ 婁近垣重輯,惠遠謨校,《龍虎山志》(乾隆五年首刊本),卷1,〈修上清宮上諭〉,頁1a-3a。

理。¹⁶這樣，同時擔任欽安殿和大光明殿住持的婁近垣就掌管了皇城內外兩大專門服務於宗室的道教殿宇，與之同時掌管的還有皇家的道教祀典。

文獻記載，婁近垣在紫禁城內部舉辦了頻繁的禮斗科儀。他在御花園建立了四座斗壇神祠，雍正為此還專門從圓明園佛樓中分撥出十名道童在斗壇應差，又委派兩名首領太監、兩名副首領太監和二十四名普通太監專門負責在斗壇供奉香燭、培澆花樹、飼養仙鶴池魚，以及灑掃坐更等事，《欽定內務府現行則例》和《國朝宮史》都對此有記載：

雍正六年八月，遵旨於佐領管領下蘇拉內挑取道童二十名，在圓明園佛樓應差。八年，奉旨撥出十名在御花園斗壇應差。¹⁷

御花園首領二名，俱八品侍監，每月銀四兩、米四斛、公費銀七錢三分三釐；副首領二名，俱八品侍監，每月銀三兩、米三斛、公費銀七錢三分三釐；太監二十四名，每月銀二兩、米一斛半、公費銀六錢六分六釐。專司園內斗壇四神祠香燭，培澆花樹，飼養仙鶴、池魚，灑掃坐更等事。¹⁸

與雍正皇帝相比，乾隆皇帝對宮廷道士的態度就沒有那麼寬容。在雍正駕崩之後，乾隆皇帝很快驅逐了在宮廷內部為雍正煉丹的道士如張太虛和王定乾等人，並且宣稱雍正皇帝視道教修煉為「遊戲消閒」：

皇考萬幾余暇，聞外間有爐火修煉之說，聖心深知其非，聊欲試觀其術，以為遊戲消閒之具。因將張太虛、王定乾等數人置于西苑空閒之地。聖心視之，如俳優人等耳，未曾聽其一言，未曾用其一藥，且深知其為市井無賴之徒，最好造言生事。皇考向朕與和親王面諭者屢矣。今朕將伊等驅出，各回本籍。令莽鵠立傳旨宣諭，伊等平時不安本分、狂妄乖張、惑世欺民、有干法紀，久為皇考之所洞鑒。茲從寬驅逐，乃再造之恩。若伊等因內廷行走數年，捏稱在大行皇帝御前一言一字，以及在外招搖煽惑，斷無不敗露之理，一經訪聞，定嚴行拏究，立即正法，決不寬貸。¹⁹

¹⁶ 婁近垣重輯，惠遠謨校，《龍虎山志》（乾隆五年首刊本），卷1，頁6-7。

¹⁷ 內務府編，《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二種》，收入《故宮珍本叢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第307冊，頁122。

¹⁸ 鄂爾泰、張廷玉等奉敕編纂，《國朝宮史》，收入《故宮珍本叢刊》，第312冊，卷21，頁402a。

¹⁹ 《高宗純皇帝實錄（一）》，收入《清實錄》，第9冊，卷1，頁148。

但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婁近垣在這場驅逐中不但未受影響，反而獲得敕封。九月初三日，清高宗覃恩授婁近垣通議大夫，食三品俸，並追贈祖父母、父母誥命。²⁰乾隆元年，又諭旨「妙正真人婁近垣帶管道錄司印務、東嶽廟住持，餘如故」。²¹直到乾隆四十一年(1776)羽化，婁近垣在京城居住時間近五十年之久，他除了為皇帝、宗室舉辦道教科儀，又管理大光明殿和東嶽廟等道觀，並掌管國家道教管理機構道錄司，成為當時最有權勢的正一派道士之一。

二、婁近垣的交遊網絡

婁近垣在京城近五十年的時間裡，除了參與、組織宗教事務，也建立了個人的交遊網絡，以下將他的交遊人員分為宗室成員、江南京官和內官太監三個群體分別討論。

(一)宗室成員

雖然清廷對道教並無尊崇之舉，但宗室內部卻不乏參玄訪道之人。尹志華在〈清朝宗室與道教〉一文中考證了清朝宗室成員與道教的聯繫。²²婁近垣作為宮廷道士，在紫禁城內部以及京城皇家道觀舉行齋醮儀式，與宗室成員有交往，有明確資料記載的有和碩履親王允禔、多羅慎郡王允禧、多羅寧郡王弘皎、和碩和親王弘晝，以及和碩果親王弘瞻。

尹志華在〈清朝宗室與道教〉一文中已經討論過一批宗室王公與婁近垣交往的情況，如和碩履親王允禔、多羅慎郡王允禧、多羅寧郡王弘皎在婁近垣五十歲壽誕時贈詩，慎郡王允禧還為婁近垣題詩《題婁真人小照》，以及和碩和親王弘晝喜好道教科儀並對婁近垣刊刻的《黃籙科儀》「親加批閱、重為鏤板」，後來又命婁近垣檢校重訂《梵音斗科》和《太極靈寶祭煉科儀》

²⁰ 婁近垣重輯，惠遠謨校，《龍虎山志》(乾隆五年首刊本)，卷1，頁8a-12b。

²¹ 婁近垣重輯，惠遠謨校，《龍虎山志》(乾隆五年首刊本)，卷8，頁6a。

²² 尹志華，〈清朝宗室與道教〉，《宗教學研究》，第4期(成都，2017.12)，頁59-65。

等事跡。²³以《太極靈寶祭煉科儀》為例，婁近垣在序言中說，「是科見於宋之大成金書，而姑蘇元都觀鐵竹施先生曾為刊布，流傳既久，亥豕多訛。恭遇和碩和親王，垂念于萬法之緣，留心于至道之典，手取斯編，命近垣增訂，廣為考核，附錄其中。俾閱之者一目了然，即能通曉，付之剞劂，垂惠將來。」²⁴經過和碩和親王弘晝的推動，婁近垣將這部祭煉科儀重新增訂，不僅使儀式結構更完整，而且增加了儀式過程中的角色說明和儀式內容解釋，詳細說明了法師或班科在儀式過程中應如何操作等細節，使之成為了一部可參照學習的科儀書。《太極靈寶祭煉科儀》增訂之後廣泛流傳，時至今日蘇州地區正一道教度亡儀式「太乙煉」依然以此為科本，除此之外，《太極靈寶祭煉科儀》還影響了中國華南及港澳地區的度亡儀式「大三清」，其科儀本《先天斛食濟煉幽科》即是以《太極靈寶祭煉科儀》為底本，同時吸收了全真派鐵罐施食科儀而建構出來的。²⁵

除了和碩和親王與婁近垣的交往及他對江南道教儀式的推廣，這裡再補充一些之前研究中沒有提到的多羅慎郡王與婁近垣的交往事蹟，比如多羅慎郡王允禧除了為婁近垣贈賀壽詩、題照之外，還曾書寫碑記。乾隆十一年(1746)，和碩莊親王允祿將京城大石橋北妙緣觀交與婁近垣掌管，並倡捐修葺。乾隆十七年(1752)，當時著名的詩人、學者沈德潛八十大壽，婁近垣遙寄書信以賀壽並為妙緣觀乞文。沈德潛在乾隆二十年(1755)完成撰文，後來由「多羅慎郡王允禧」書寫、「誥授資政大夫工部左侍郎加四級董邦達」篆額，於乾隆二十一年(1756)立碑，名〈妙緣觀碑〉。²⁶「多羅慎郡王允禧」即康熙第二十一子，雍正八年(1730)二月封貝子，五月進貝勒，雍正十三年(1735)十

²³ 尹志華，〈清朝宗室與道教〉，頁 60-61。

²⁴ 婁近垣增訂，《太極靈寶祭煉科儀》(清乾隆三十二年刻本)，南京圖書館藏，編號 GJ/3006497，頁 1a。相同版本另見《藏外道書》(成都：巴蜀書社，1992-1994)第 17 冊，頁 628a。

²⁵ 黎志添，〈《先天斛食濟煉幽科》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51 期(香港，2010.07)，頁 117-137。

²⁶ 「碑在北京西城區大石橋。拓片碑身高 175 釐米，寬 89 釐米，額高 42 釐米，寬 36 釐米。」沈德潛撰，允禧正書，董邦達篆額，〈妙緣觀碑〉，收入《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1991)第 71 冊，頁 74。

一月，清高宗即位，進慎郡王。允禧工詩畫，號紫瓊道人。²⁷從他的名號「紫瓊道人」也可以看出他與道教的關係。

除了和碩履親王允禔、多羅慎郡王允禧、多羅寧郡王弘皎、和碩和親王弘晝與婁近垣有交往之外，和碩果親王弘瞻也曾為婁近垣作賀壽詩。乾隆二十二年(1757)婁近垣七十歲的時候，和碩果親王弘瞻作了一首七言古詩賀壽，名為〈和碩果親王長句奉祝妙正真人三臣婁先生七十壽〉。²⁸

通常認為爵位是「和碩果親王」的是清聖祖康熙第十七子愛新覺羅允禮，但他卒於清乾隆三年(1738)，自然不可能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為婁近垣賀壽。此處的「和碩果親王」應當是清世宗雍正第六子弘瞻(1733-1765)，清乾隆三年(1738)乾隆將他過繼給「和碩果親王」允禮為子。對此，《清實錄》中有詳細記載，「又諭，果親王薨逝，朕篤念親親之誼，此爵自應久遠承襲，但王無子嗣，其如何承襲之處，著莊親王、和親王、慎郡王、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會議具奏」。以及，「諭果親王喪事，著大阿哥永璜前往穿孝。又諭王大臣等請將朕第六阿哥承襲果親王之處，朕奏聞皇太后，欽奉皇太后懿旨，既經王大臣等定議，具奏著照所請，令六阿哥弘瞻襲封果親王」。²⁹儘管這一支的封號並未獲得世襲罔替，但是在過繼之初弘瞻得以承襲果親王爵位，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獲罪降為貝勒。³⁰

另外，弘瞻善詩詞，雅好藏書，在他的藏書中發現了很多諸如「果親王府圖籍」、「果親王點定」、「果親王府圖書記」、「果親王益壽主人月讀左傳已過」（「益壽主人」是他的號）、「果親王讀本」的印，³¹所以為婁近垣撰

²⁷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卷 220，頁 9084-9085。

²⁸ 婁近垣重輯，惠遠謨校，舒運本增補，《龍虎山志》（道光十二年增補本），收入《中國道觀志叢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第 25、26 冊，卷 13，頁 679-680。

²⁹ 《高宗純皇帝實錄（二）》，收入《清實錄》，第 10 冊，卷 62，頁 16 a-17a。

³⁰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 220，頁 9083-9084。另參韓曉梅，〈乾隆帝革去弘瞻親王爵位始末探析〉，《吉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3 期（四平，2019.05），頁 21-27。

³¹ 李玉安、黃正雨編著，《中國藏書家通典》（香港：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2005），頁 440-441。另外，《西清古鑑》中的落款也是「和碩果親王臣弘瞻」。梁詩正、蔣溥等奉勅編，《西清古鑑》（清乾隆內務府刊本，劍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頁 1a。

寫賀壽詩的「和碩果親王」應當是清世宗雍正第六子弘瞻。弘瞻幼年時曾受學於沈德潛，這正是為婁近垣的妙緣觀撰文的人，下文詳述。

(二)江南京官

除了與宗室成員交往，婁近垣與在京官員、尤其是江南籍京官也有廣泛的交遊往來，其中還有一些官員拜婁近垣為師，稱為「法弟子」³²，這些江南京官在婁近垣的交遊網絡中佔據了相當一部分比重。

上文提及果親王弘瞻幼年時的老師、為婁近垣撰寫〈妙緣觀碑〉文的沈德潛就是其中一位。沈德潛，字碣士，江南長洲(今江蘇蘇州)人，是當時的文學大家，乾隆曾將沈德潛與錢陳群並稱為「東南二老」。³³這兩位江南大儒都與婁近垣有過交往。錢陳群(1686-1774)，字主敬，號香樹，是浙江嘉興人。他於康熙六十年(1721)中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歷任右通政、內閣學士、刑部侍郎和太子太傅等職。³⁴乾隆七年(1742)，婁近垣回到家鄉楓涇鎮重修了他少年入道的仁濟道院，當時為他撰寫〈重修仁濟道院記略〉的正是當時的刑部侍郎錢陳群，文中說「余與朗齋素為方外交」，可見二人交情匪淺。³⁵

除了「東南二老」，我們還發現了兩份為婁近垣賀壽的文獻，從這兩份文獻資料切入可以以點帶面逐步打開婁近垣複雜而龐大的社交網絡。其中一份是婁近垣五十歲壽誕時，同鄉為婁近垣徵集了百餘首賀壽詩並集成《知非

³² 清代文人皈依道教並且受籙/受戒的情況並不罕見，比如前文提到尹志華的研究中清代宗室成員皈依道教並且受籙/受戒的情況，以及王見川研究中彭定求拜穹窿山道士施道淵為師並受文昌寶籙的例子等。我們在其他文集中發現的與「法弟子」相類似的稱呼還有「弟子」、「法弟」、「道弟子」、「奉教弟子」、「教下弟子」等，但是在婁近垣的例子中，我們還尚未發現足夠的材料來說明他的法弟子只是拜他為師，還是舉行了受籙儀式的，以及他們所受的是哪種文本的「籙」、受籙的儀式是怎樣的等問題。

³³ 沈德潛，生於康熙十二年(1673)，直到乾隆四年(1739)才考中進士，改庶吉士，當時他已經六十七歲。歷任翰林院散館、編修、中允、內閣學士、禮部侍郎、禮部尚書、太子太傅等官職。乾隆三十四年(1769)卒，贈太子太師，祀賢良祠，清高宗乾隆親自作詩以為哀悼。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305，頁10511-10512。

³⁴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305，頁10507-10510。

³⁵ 「朗齋」是婁近垣的字。曹相駿纂，許光墉增纂，《重輯楓涇小志》，卷2，〈重修仁濟道院記略〉，頁27b。

贈言錄》一卷，婁近垣從中選取並收入《龍虎山志》的二十四首。這二十四首賀壽詩的作者分別是和碩履親王允禔、多羅慎郡王允禧、多羅寧郡王弘皎、大廷尉汪灃、大司寇史貽直、少司農托時、大宗伯任蘭枝、少冢宰程元章、大司寇張照、少宗伯吳家騏、少宗伯張廷璐、少司空張廷瑑、侍讀學士鄒升恒、內閣學士許王猷、少司寇勵宗萬、內閣學士汪由敦、少司農梁詩正、少冢宰陳大受、殿元于振、殿元彭啟豐、兵備道莊柱、御史劉方藹、都諫倪國璉和殿元莊有恭等。³⁶另一份是婁近垣七十歲壽誕時，他的受業門人和法弟子為他撰寫的賀壽序言，其中落款的法弟子有程盛修、程鍾彥、朱佩蓮、盧明楷、陳作梅、周曰贊、范棫士、胡廷樞、莊培因、倪承寬、陳孝泳、蔡以臺、彭元瑞、黃啟昌、宋允睿、裘麟、李灝、江二儀、陳文偉、郭墉、李法、李深、夏秉衡、唐准、張中立、汪墉、董誥、周震葉、王啟焜、葉伯圭、梁同書和謝墉等。³⁷以下分別整理了這兩份名單中查有所據的官員籍貫和官職等信息，如表一、表二所示。

附表一、婁近垣五十歲壽辰賀壽官員信息

姓名	身份/籍貫	爵位/官職/品秩
和碩履親王允禔(康熙二十四年-乾隆二十八年，1686-1763) ³⁸	清聖祖康熙第十二子	親王

³⁶ 婁近垣重輯，惠遠謨校，舒運本增補，《龍虎山志》(道光十二年增補本)，收入《中國道觀志叢刊》，第25、26冊，卷13，頁683-695。婁近垣重輯，惠遠謨校，舒運本增補，《龍虎山志》(道光十二年增補本)，收入《三洞拾遺》(合肥：黃山書社，2005)第13冊，卷13，頁274-277。這兩部叢書中收錄的《龍虎山志》均是舒運本道光十二年增補本，其中卷十三中的「附知非贈言」也即官員贈婁近垣五十歲賀壽詩內容是一樣的，但是《中國道觀志叢刊》中收錄的《龍虎山志》不包含法弟子贈婁近垣七十歲賀壽序，而《三洞拾遺》中收錄的《龍虎山志》中的〈和碩果親王長句奉祝妙正真人三臣婁先生七十壽〉是不完整的殘篇，所以本文在引用的時候使用了不同的收錄本。

³⁷ 婁近垣重輯，惠遠謨校，舒運本增補，《龍虎山志》(道光十二年增補本)，收入《三洞拾遺》，第13冊，卷15，頁304-305。

³⁸ 和碩履親王允禔出生於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十二月廿四日，當時已經是西元1686年。

多羅慎郡王允禧(康熙五十年-乾隆二十三年, 1711-1758)	清聖祖康熙第二十一子	郡王
多羅寧郡王弘皎(康熙五十二年-乾隆二十九年, 1713-1764)	清聖祖康熙第十三子怡親王允祥第四子	郡王
汪澂(?-乾隆七年, ?-1742)	安徽休寧人(今安徽省休寧縣), 康熙三十三年進士	大理寺卿(正三品)(000224) ³⁹
史貽直(康熙二十一年-乾隆二十八年, 1682-1763)	江蘇溧陽人(今江蘇省溧陽市), 康熙三十九年進士	刑部尚書(從一品)(000079)
托時(?-乾隆二十五年, ?-1760)	滿洲正黃旗	戶部左侍郎(從二品)(000732)
任蘭枝(康熙十六年-乾隆十一年, 1677-1746)	江蘇溧陽(今江蘇省溧陽市)人, 康熙五十二年進士	禮部尚書(從一品)(000647)
程元章(康熙二十六年-乾隆三十二年, 1687-1767)	河南上蔡縣人(今河南省上蔡縣), 康熙六十年進士	吏部左侍郎(從二品)(000705)
張照(康熙三十年-乾隆十年, 1691-1745)	江蘇省松江府婁縣(今上海市金山區)	刑部尚書(從一品)(001773) ⁴⁰
吳家騏(康熙?年-乾隆?年, 不詳)	浙江省嘉興府桐鄉縣(今浙江省桐鄉市)	禮部右侍郎(從二品)(002736)
張廷璐(康熙十四年-乾隆十年, 1675-1745)	安徽省安慶府桐城縣人(今安徽省桐城市)	禮部左侍郎(從二品)(001611)
張廷琮(康熙二十年-乾隆二十九年, 1681-1764)	安徽省安慶府桐城縣人(今安徽省桐城市)	工部侍郎(從二品)(000181)
鄒升恆(生卒年不詳)	江蘇省常州府無錫縣(今江蘇省無錫市)	侍讀學士(從四品)
許王猷(生卒年不詳)	浙江省嘉興府嘉善縣(今浙江省嘉善縣)	內閣學士(從二品)(004143)
勵宗萬(康熙四十四年-乾隆二十四年, 1705-1759)	直隸省河間府靜海縣(今天津市靜海縣)	刑部左侍郎(從二品)(002681) ⁴¹

³⁹ 引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明清檔案人名權威資料庫」
(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l_name/search.php) 權威號, 下同。
最後檢索日期: 2020年6月10日。

⁴⁰ 「大司寇」應當指刑部尚書, 目前所知只有乾隆二年張照擔任「禮部侍郎兼內閣學士」的信息, 所以這有可能是後期編輯《龍虎山志》時重新冠名。

⁴¹ 「少司寇」應當指刑部侍郎, 目前所知只有乾隆二年勵宗萬任「武英殿行走」, 以及他於雍正十三年至乾隆元年擔任刑部左侍郎的信息。

汪由敦(?-乾隆二十三年,?-1758)	浙江省杭州市錢塘縣(今浙江省杭州市)	內閣學士(從二品)(002286)
梁詩正(康熙三十六年-乾隆二十八年,1697-1763)	浙江省杭州市錢塘縣(今浙江省杭州市)	戶部右侍郎(從二品)(001846)
陳大受(康熙四十一年-乾隆十六年,1702-1751)	湖南省永州府祁陽縣(今湖南省祁陽縣)	吏部右侍郎(從二品)(001017)
于振(康熙二十九年-乾隆十五年,1690-1750)	江蘇省鎮江府金壇縣(今江蘇省常州市金壇區)	雍正元年殿元
彭啟豐(康熙四十年-乾隆四十九年,1701-1784)	江蘇省蘇州府長洲縣(今江蘇省蘇州市)	雍正五年殿元、侍講學士(從四品)(000057)
莊柱(康熙二十九年-乾隆二十四年,1690-1759)	江蘇省常州府武進縣(今江蘇省常州市)	浙江海防兵備道(038288)
劉方濤(不詳)	安徽省寧國府宣城縣(今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區)	御史 ⁴²
倪國璉(康熙?年-乾隆八年,?-1743)	浙江省杭州府仁和縣(今浙江省杭州市)	吏科給事中(正五品)(003167)
莊有恭(康熙五十二年-乾隆三十二年,1713-1767)	廣東省廣州府番禺縣(今廣東省廣州市)	乾隆四年殿元

附表二、婁近垣賀七十歲壽辰賀壽受業門人和法弟子信息

姓名	籍貫	官職
程盛修(生卒年不詳)	江蘇省揚州府泰州縣(今江蘇省泰州市)	鴻臚寺卿/光祿寺卿(006338)
程鍾彥(生卒年不詳)	浙江省嘉興府嘉善縣(今浙江省嘉善縣)	不詳
朱佩蓮(生卒年不詳)	浙江省杭州府海寧縣(今浙江省海寧市鹽官鎮)	日講起居注官(006113)

⁴² 資料庫中只記載了劉方濤於乾隆二年任「刑部福建司員外郎」、「會試同考官」和「吏部驗封司郎中」的信息，但是根據《國朝御史題名》中的記載，劉方濤擔任的可能不是「廣西道御史」。「劉方濤，江南宣城人，雍正丁未進士，由吏部郎中考選廣西道御史，轉禮科給事中，外轉洮岷道，陞湖北按察使」，黃叔瓚撰，戴璐等續補，《國朝御史題名》，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第751冊，頁328b。

盧明楷(康熙四十一年-乾隆三十一年, 1702-1766)	江西省贛州府寧都縣(今江西省寧都縣)	翰林院侍講學士 (006287)
陳作梅(康熙五十五年-?, 1716-?)	浙江省嘉興府嘉善縣(今浙江省嘉善縣)	掌江南道監察御史 (012506)
周曰贊(不詳)	江蘇省常州府金匱縣(今江蘇省無錫市)	戶部貴州司主事 (005299)
范棧士(康熙四十九年-?, 1710-?)	江蘇省松江府華亭縣(今上海市松江區)	福建道監察御史 (012229) ⁴³
莊培因(生卒年不詳)	江蘇省常州府陽湖縣(今江蘇省常州市)	日講起居注官/福建鄉試正考官(030379) ⁴⁴
倪承寬(康熙五十一年-乾隆四十八年, 1712-1783)	浙江省杭州市仁和縣(今浙江省杭州市)	翰林院編修/尚書房行走(000148) ⁴⁵
陳孝泳(?-乾隆四十四年, ?-1779)	江蘇省松江府婁縣(今上海市金山區)	國子監助教(008948) ⁴⁶
彭元瑞(雍正九年-嘉慶九年, 1731-1803)	江西省南昌府南昌縣(今江西省南昌市)	翰林院庶吉士 (000081)
王啟焜(雍正八年-嘉慶三年, 1730-1798)	浙江省嘉興府嘉善縣(今浙江省嘉善縣)	以縣丞發四川差遣(捐)(004901)
梁同書(雍正元年-嘉慶二十年, 1723-1815)	浙江省杭州府錢塘縣(今浙江省杭州市)	會試同考官(009399)
謝墉(康熙五十八年-乾隆六十年, 1719-1795)	浙江省嘉興府嘉善縣(今浙江省嘉善縣)	編修(000055)

從表中可以發現，與婁近垣交往的官員上至親王、郡王、一品尚書、二品侍郎，下至四品侍講學士、五品給事中，其中不乏達官顯貴，如史貽直、張照和汪由敦這樣的當朝風雲人物。雍正朝至乾隆朝初期，分別以鄂爾泰和張廷玉為首的兩大朋黨之間的爭鬥劍拔弩張，其中以鄂爾泰和張照、張廷玉和史貽直之間的相互打壓尤為突出，朝廷官員亦不免各有依附。⁴⁷而與婁近垣交

⁴³ 范棧士自乾隆二十一年起任福建道監察御史，未知離任時間。

⁴⁴ 莊培因自乾隆二十年起任日講起居注官，未知離任時間，另於乾隆二十一年任福建鄉試正考官。

⁴⁵ 倪承寬自乾隆二十年起任翰林院編修，於乾隆二十二年上書房行走，均未知離任時間。

⁴⁶ 陳孝勇在乾隆三十一年之前任國子監助教，未知起始時間。

⁴⁷ 賴惠敏，〈論乾隆朝初期之滿黨與漢黨〉，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與戴維斯加州大學歷史系合辦，《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下冊》(臺北：中央研究

往的官員既有親張廷玉一派，也有親鄂爾泰一派，其實早在雍正時期，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寶親王弘曆(後來的乾隆皇帝)、和親王弘晝、鄂爾泰、張廷玉、張照和婁近垣就同為雍正的「門徒」。雍正自詡於佛法禪理頗有心得，曾在宮中舉行法會，親自參禪說法，並且招收了十四名弟子。

是年(雍正十一年，筆者註)，雍正帝在宮中舉行法會，召集全國有學行僧人參加。雍正帝親自說法，收門徒十四人：莊親王允祿號愛月居士，果親王允禮號自得居士，寶親王弘曆號長春居士，和親王弘晝號旭日居士，平郡王福彭號如心居士，大學士鄂爾泰號坦然居士，大學士張廷玉號澄懷居士，左都御史張照號得意居士，文覺禪師元信雪鴻，悟修禪師明慧楚雲，妙正真人婁近垣，僧超善若水，僧超鼎玉鉉，僧超盛如川，計親郡王五人、大臣三人、僧五人、道一人。⁴⁸

婁近垣早就與鄂爾泰和張廷玉有交往，也是他日後結交兩黨人員的一個原因，不過與婁近垣交往的官員更多是親張廷玉一派，如張廷璐、張廷瑑、汪由敦和張照等。⁴⁹

張廷玉、張廷璐和張廷瑑同為大學士張英之子。⁵⁰張廷玉是張英次子，字衡臣，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進士，乾隆繼位之後，張廷玉同莊親王允祿、果親王允禮、大學士鄂爾泰共同輔政，仍兼管翰林院事，他是整個清朝唯一配享太廟的漢臣。⁵¹張廷璐是張英第三子，字寶臣，康熙五十七年(1718)殿試

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06)，頁 723-743。文中將親鄂爾泰一系稱為「滿黨」，親張廷玉一系稱為「漢黨」，但實際上，親鄂爾泰一系中也有很多漢人大臣，不單以滿族、漢族區分，因此本文將其稱為「鄂黨」與「張黨」。

⁴⁸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編，《清史編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卷 4，頁 588。

⁴⁹ 徐凱，〈論雍乾樞要之臣張廷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 4 期(北京，1992.07)，頁 91-98。

⁵⁰ 張英，字敦復，江南桐城(今安徽桐城)人。康熙六年中進士，選為庶吉士，授編修，充日講起居注官，累遷侍讀學士。十六年，入值南書房，賜第西安門內。後遷翰林院學士兼禮部侍郎，歷任兵部侍郎、工部尚書等，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亦充任《國史》、《一統志》、《淵鑿類函》、《政治典訓》和《平定朔漢方略》等總裁官。《清史稿》，卷 267，頁 9965。

⁵¹ 張廷玉於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入值南書房，康熙朝歷任侍講學士、內閣學士、刑部侍郎等職。雍正朝又歷任禮部尚書、戶部尚書、吏部

一甲第二名進士，前文提到的和碩果親王弘瞻之師、為婁近垣撰寫〈重修妙緣觀碑記〉的沈德潛即是其門生。張英四子張廷瑑，字恆臣，雍正元年(1723)中進士，張廷璐與張廷瑑都曾任過禮部侍郎。⁵²清朝的國家道教管理機構道錄司也正是歸禮部管轄，而婁近垣掌管了當時的道錄司印務事，是道錄司的最高管理者，張廷璐和張廷瑑兄弟二人都曾為婁近垣贈詩。

除了張廷玉兄弟三人，與婁近垣有交往的汪由敦既是張廷玉的門生，也是張廷玉一派的重要人物。汪由敦，字師茗，浙江錢塘人。乾隆十一年(1746)，張廷玉舉薦汪由敦入值軍機處，後歷任戶部侍郎、工部尚書、刑部尚書、工部尚書、吏部尚書等職。⁵³乾隆二年(1737)，婁近垣五十歲壽辰，汪由敦作詩以贈，當時他還是從二品的內閣學士。

另一位與婁近垣有交往的張照也是張廷玉一派中的核心人物。張照，字得天，江南婁縣人，與婁近垣恰好是同鄉。張照自康熙五十四年(1715)四月入值南書房，直到乾隆十年(1745)去世，這三十年間幾乎一直侍從三代帝王身邊，尤其與清世宗、清高宗的關係非常親近。⁵⁴張照與婁近垣既同是雍正門徒，又是同鄉，關係密切。乾隆五年(1740)，婁近垣為京師真人府立碑，即是由時任經筵講官刑部右侍郎張照書寫。這通碑名〈敕賜重建真人府碑記〉，碑文由署理

尚書等職，授翰林院掌院學士、文淵閣大學士、文華殿大學士、保和殿大學士等。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 288，頁 10237-10240。

⁵² 張廷璐，康熙五十七年(1718)殿試一甲第二名進士，授編修，值南書房，遷侍講學士。曾督學河南、江蘇學政，官至禮部侍郎。張廷瑑，雍正元年(1723)中進士，自編修累官工部侍郎，充日講起居注官。乾隆九年(1744)，改補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曾典試江西。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 267，頁 9966-9967。

⁵³ 汪由敦，雍正二年(1724)中進士，選庶吉士，遷內閣學士，入值上書房，累遷工部尚書、刑部尚書。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 302，頁 10456-10458。

⁵⁴ 張照，康熙四十八年(1709)中進士，改庶吉士，授檢討，南書房行走。雍正初，累遷侍講學士，復三遷刑部侍郎。雍正十一年(1733)，授左都御史，遷刑部尚書。雍正十三年(1735)五月，任命為撫定苗疆大臣。清高宗乾隆繼位之後，因張照與鄂爾泰交惡，在平定苗疆叛亂過程中被指互相彈劾以誤軍情，從而被奪職下獄。乾隆元年(1736)獲釋，令在武英殿修書處行走。乾隆二年(1737)，起內閣學士，南書房行走。乾隆五年(1740)，復授刑部侍郎。乾隆七年(1742)，擢刑部尚書，兼領樂部。乾隆九年(1744)十二月，父歿，張照於奔喪途中卒，加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謚文敏。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 304，頁 10493-10494。關於張照更多信息可以參考梁繼，《張照年譜》(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

大真人張昭麟撰文，禮科給事中前都察院御史翰林院編修程鍾彥篆額，⁵⁵這位程鍾彥則是婁近垣的「法弟子」，即拜婁近垣為師的俗家弟子。

程鍾彥，字驥超，號芥亭，祖籍浙江嘉善，與婁近垣的家鄉婁縣相毗鄰。⁵⁶程鍾彥與婁近垣不僅是同鄉的關係，還是婁近垣的「法弟子」，他在婁近垣七十歲壽誕時與其他「法弟子」一同為婁近垣寫了〈恭祝敕封妙正真人朗齋婁老先生七十壽序〉。⁵⁷

雖然婁近垣的交往圈子中更多的是親張廷玉一派，但是親鄂爾泰一派的官員也有不少，如史貽直、于振和于敏中等。鄂爾泰，字毅庵，西林覺羅氏，滿洲鑲藍旗人。乾隆繼位之後，鄂爾泰與張廷玉同為輔政大臣。⁵⁸雖然同為輔政大臣，但鄂爾泰與張廷玉兩人的關係並不和睦。《嘯亭雜錄》中記載，「(張廷玉，筆者註)以謙沖自居，與鄂文端公同事十餘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語。鄂公有所過失，公必以微語譏諷，使鄂公無以自容」。⁵⁹

當前研究認為鄂黨與張黨的爭鬥主要體現在以下三次事件，其一是雍正十三年(1735)，鄂爾泰實行「改土歸流」政策的苗疆地區由於地方矛盾引發動亂，前來安撫苗人的刑部尚書張照由此彈劾鄂爾泰政策失敗，而張照也被彈劾貽誤軍情，從而被奪職下獄。其二是乾隆六年(1741)，鄂爾泰門生仲永檀與

⁵⁵ 張昭麟撰，張照正書，程鍾彥篆額，焦國華鐫，〈大真人府碑〉，收入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1991)第69冊，頁64。

⁵⁶ 程鍾彥，雍正十一年(1733)中進士，由翰林院編修考選陝西道御史，轉禮科給事中，巡視南城東城，禮科掌印淮安通州巡漕，署京畿道，巡視北城，陞太常寺少卿。乾隆四年(1739)，程鍾彥作為陝西道監察御史上疏，請飭修東南水利。黃叔瓚撰，戴璐等續補，《國朝御史題名》，史部職官類，頁328b。佚名，《皇清奏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473冊，卷35，頁297b-298a。

⁵⁷ 婁近垣重輯，惠遠謨校，舒運本增補，《龍虎山志》(道光十二年增補本)，收入《三洞拾遺》，第13冊，卷15，頁304a-305b。

⁵⁸ 鄂爾泰，康熙三十八年(1699)舉人，康熙四十二年(1703)襲佐領，授三等待衛。康熙五十五年(1716)，遷內務府員外郎。雍正元年(1723)，充雲南鄉試考官，特擢江蘇布政使。雍正三年(1725)，遷廣西巡撫，又調雲南，行總督職權，他實施「改土歸流」的政策，官至總督雲南、貴州、廣西三省。雍正十年(1732)，拜保和殿大學士，兼兵部尚書，辦理軍機事務。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288，頁10229-10236。

⁵⁹ 昭槤撰，何英芳點校，《嘯亭雜錄》，收入《清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6，頁183。

鄂爾泰之子鄂容安彈劾張廷玉、許王猷等人參與俞君弼女婿謀奪家產一事。其三是胡中藻文字獄一案，除鄂容安與鄂爾泰之侄鄂昌之外，還有一眾官員受到牽連，如李蘊芳、張紹渠和裘曰修等。這三次事件中涉及的人物，除了鄂爾泰、張廷玉和張照之外，許王猷、鄂昌和裘曰修也都與婁近垣有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其中，鄂爾泰之侄鄂昌與史貽直關係深厚，他效仿漢人之習稱史貽直伯父，史貽直曾保薦鄂昌任陝西巡撫，鄂昌入獄之後供出史貽直囑託鄂昌為次子史奕昂謀求甘肅布政使缺一事，史貽直也因此被治罪。⁶⁰史貽直，字儆弦，江蘇溧陽人，他也曾為婁近垣五十歲壽辰贈詩。⁶¹

裘曰修，字叔度，江西新建人。乾隆四年(1739)中進士，改庶吉士。自編修五遷至侍郎，歷任兵、吏、戶諸部。⁶²裘曰修之子裘麟是婁近垣的法弟子。裘麟，字超然，乾隆二十五年(1760)中進士，改授翰林院庶吉士。二十六年(1761)，散館授編修。⁶³裘曰修對婁近垣的另一個法弟子陳孝泳也有推舉之恩。陳孝泳，字廣言，與婁近垣同是婁縣人。乾隆十年(1745)，詔修《西清古鑑》，汪由敦舉薦他入齋宮校閱。乾隆十七年(1752)，順天鄉試中舉人，《西清古鑑》書成之後留供奉懋勤殿。裘曰修舉薦他任學政，累遷鴻臚寺少卿，特命同南

⁶⁰ 賴惠敏，〈論乾隆朝初期之滿黨與漢黨〉，頁 732-739。

⁶¹ 史貽直，康熙三十九年(1700)中進士，自檢討五遷侍讀學士。雍正初，命在南書房行走，再遷吏部侍郎，歷工部、戶部。雍正七年(1729)，命署福建總督。八年(1730)，調署兩江總督，授左都御史。九年(1731)，命協理陝西巡撫，擢兵部尚書。十年(1732)，授戶部尚書，總理陝西巡撫。乾隆繼位之後，命署湖廣總督，歷工、刑、兵、吏諸部尚書。乾隆七年(1742)，命署直隸總督，協辦大學士。九年(1744)，授文淵閣大學士。十一年(1746)，加太子太保。二十年(1755)，因鄂昌一事致仕回籍。二十二年(1757)，尋召還，仍授大學士，命領工部，加太子太傅。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 303，頁 10474-10477。

⁶²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 321，頁 10773。

⁶³ 裘曰修撰，《裘文達公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441 冊，卷 6，〈皇清例授文林郎翰林院編修長男裘麟墓誌銘〉，頁 123a-124b。

書房行走，改通政使參議轉副使，陞光祿寺卿。⁶⁴乾隆四十一年(1776)，婁近垣羽化之後，陳孝泳曾請求陸錫熊為婁近垣撰寫墓誌銘。⁶⁵

陸錫熊，字健男，江蘇省松江府上海縣(今上海市)人，乾隆二十六年(1761)中進士，授內閣中書，遷刑部郎中，與紀昀同任《四庫全書》總編纂官，授翰林院侍讀，五遷左副都御史。⁶⁶陸錫熊與婁近垣祖籍相近，乾隆五十三年(1788)刻本《婁縣志》就是他編纂的。陸錫熊為婁近垣撰寫的墓誌銘載於他的《寶奎堂集》，另外，嘉慶《松江府志》、光緒《重輯楓涇小志》和光緒《嘉興府志》中都有簡短的婁近垣傳記，但其中均記載于文襄曾為婁近垣作墓誌銘。⁶⁷于文襄即于敏中，字叔子，江蘇金壇(今江蘇省常州市金壇區)人，主四庫全書館正總裁，又充國史館、三通館正總裁，是清乾隆年間最重要的漢臣之一。⁶⁸他曾舉薦陸錫熊任《四庫全書》總編纂官，亦是陸錫熊的座師。兩人的關係非常密切，陸錫熊為于敏中擬定了與《四庫全書》編修有關的各種文稿，《于文襄手札》中收錄了自乾隆三十八年至四十一年于敏中致陸錫熊信五十六通。⁶⁹將嘉慶《松江府志》、光緒《重輯楓涇小志》和光緒《嘉興府志》這三部地方志中的婁近垣傳記與《寶奎堂集》中收錄的墓誌銘比較可以發現，

⁶⁴ 宋如林修，孫星衍、莫晉纂，嘉慶《松江府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上海府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成都：巴蜀書社聯合出版，1991)第2冊，卷60，頁2a。

⁶⁵ 墓誌銘中記載：「通政司副使陳君孝泳來乞銘」。陸錫熊撰，《寶奎堂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第383冊，卷9，〈皇清誥授通議大夫妙正真人龍虎山上清宮四品提點婁公墓誌銘〉，頁181b。

⁶⁶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320，頁10771。

⁶⁷ 宋如林修，孫星衍、莫晉纂，嘉慶《松江府志》，卷63，頁501b-502a。曹相駿纂，許光墉增纂，光緒《重輯楓涇小志》，卷6，頁106a。許瑤光修，吳仰賢纂，光緒《嘉興府志(二)》，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輯》，第13冊，卷62，頁902。

⁶⁸ 于敏中，乾隆三年(1738)一甲一名進士，授翰林院修撰，累遷侍講，典山西鄉試，督山東、浙江學政。十五年(1750)，值上書房，累遷內閣學士。十八年(1753)，復督山東學政，擢兵部侍郎。二十二年(1757)，署刑部侍郎。二十五年(1760)，命為軍機大臣。三十年(1765)，擢戶部尚書。三十三年(1768)，加太子太保。三十六年(1771)，協辦大學士。三十八年(1773)，晉文華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319，頁10749-10752。

⁶⁹ 張昇，〈陸錫熊與《四庫全書》編修〉，《史學史研究》，第2期(北京，2014.06)，頁108-116。

前者都是以後者作為底本。鑒於陸錫熊與于敏中的密切關係，以及他曾為于敏中擬定各種文稿的事實，所以陸錫熊撰寫的墓誌銘也可能是為于敏中代筆。

除此之外，于敏中與婁近垣的間接交往關係還在於他是史貽直的外甥，是史貽直妹夫于枋的嗣子。⁷⁰前文提及，史貽直與鄂爾泰之侄鄂昌關係深厚，還曾囑託鄂昌為次子史奕昂謀求甘肅布政使缺。史貽直與鄂爾泰同年，是繼鄂爾泰之後鄂黨的首腦人物，而于敏中堂兄于振，也曾受史貽直舉薦。于振，字鶴泉，雍正元年(1723)狀元，博學宏詞，經史貽直薦舉授翰林院編修，累陞翰林院侍讀學士。⁷¹他也為婁近垣撰寫了五十歲賀壽詩文。

另一位撰寫賀壽詩文的彭啟豐是史貽直門生，曾為史貽直撰寫神道碑文。⁷²彭啟豐，字翰文，號芝庭，江南長洲人。⁷³彭啟豐與道教的密切關係很明顯受到了家族影響，彭啟豐的祖父彭定求(1645-1719)，字勤止，號訪濂、復初老人、南响老人，晚年又自號止庵。⁷⁴他與穹窿山上真觀法師施道淵相契甚厚，並拜其為師，受文昌籙，⁷⁵後來又為施道淵作墓誌銘⁷⁶。除此之外，他還長期在家中舉行禮斗、扶乩等道教活動。⁷⁷

⁷⁰ 史全生，〈關於史貽直兩則史料的考訂〉，《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期(揚州，2011.05)，頁91。

⁷¹ 丁兆基等修，汪國鳳等纂，《金壇縣志》(清光緒十一年活字本)，收入《中國數字方志庫》，卷8，頁49b。

⁷² 史全生，〈關於史貽直兩則史料的考訂〉，頁93。

⁷³ 彭啟豐，雍正五年(1727)會試第一，殿試一甲第三，清世宗雍正欽點為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南書房行走，三遷右庶子。乾隆六年(1741)，充江西鄉試副考官，再遷左僉都御史。乾隆七年(1742)，遷通政使，督浙江學政，後來又歷任刑部侍郎、吏部侍郎、兵部侍郎和左都御史等職，乾隆三十三年(1768)，命原品休致。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304，頁10503-10504。

⁷⁴ 關於彭定求生平的研究可以參考黃阿明，〈康熙十五年狀元彭定求生平史實述略〉，《歷史檔案》，第4期(北京，2013.11)，頁80-86。

⁷⁵ 石韞玉鑒定，顧沅輯，《元妙觀志》，收入《三洞拾遺》(合肥：黃山書社，2005)第15冊，卷7，頁696a。

⁷⁶ 彭定求，《南响文稿》，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167冊，卷10，〈穹隆亮生施尊師墓表〉，頁406b-407a。

⁷⁷ 關於彭定求從事道教活動的研究可以參考游子安，〈論清代江蘇長洲彭氏家學、善書與善舉〉，《大陸雜誌》，第91卷第1期(臺北，1995.07)，頁34-44。王見川，〈彭定求(1645-1719)與清初蘇州道教：扶鸞、禮斗與著書〉，《歷史、藝術與台灣人文論叢》，第10輯(臺北，2016.11)，頁85-106。王見川，〈彭定求的扶鸞與著書一

彭啟豐還與婁近垣的教內弟子惠遠謨相交甚厚，曾多次作詩相贈，如《贈惠虛中鍊師六十》、《游仙詞題惠虛中鍊師照》等。⁷⁸惠遠謨出身世家，通曉儒書道藏，後入龍虎山大上清宮。《晚晴簃詩匯》中也有他的記載，「惠遠謨，字虛中，號澹峯，蘇州玄妙觀道士，有《學吟稿詩話》。澹峯與半農同族，儒書道藏靡不通曉。雍正初，大光明殿成，敕有司選羽士中有道法者焚修。其中澹峯與焉，師事婁真人，命提點龍虎山。乾隆中辭歸玄妙觀，賜道藏，建閣尊奉。彭芝庭尚書序其集，謂詞旨清遠，無塵俗氣，以之追配吳筠、杜光庭、鄭遨諸公，亦足以自名一家」。⁷⁹「彭芝庭」即彭啟豐，彭啟豐不僅為惠遠謨的詩稿題序，還專門為他寫了一篇傳記，也收錄在《元妙觀志》中。⁸⁰

我們看到，像汪由敦、張廷璐、張廷瑑、張照、史貽直、于敏中這些鄂、張兩黨中的核心人物，以及錢陳群、許王猷、于振、彭啟豐、程鍾彥、陳孝泳、裘麟等當朝顯赫官員都與婁近垣有相交之誼。在婁近垣的交遊網絡中，還有幾位與婁近垣交往的江南京官，他們的兒子是婁近垣的法弟子，如上文提到的蔡維熊協助婁近垣重修仁濟道院，而蔡維熊之子蔡以臺是婁近垣的法弟子，再如梁詩正曾為婁近垣作賀壽詩，梁詩正之子梁同書也是婁近垣的法弟子，相同情況的還有倪國璉和倪承寬父子，莊柱和莊培因父子，以下詳述。

婁近垣捐資重修仁濟道院，經理這件事的是同鄉蔡維熊。蔡維熊，字星若，號佚亭，性情溫厚且樂善好施，曾出銀米賑災並捐資置田，晚年創辦「尊德會」，開筵賦詩，曾被牽扯進鄂、張兩黨鬥爭的官員、書法家許王猷亦是

—從其與清初著名道士施道淵的關係談起〉，《道教學刊》，第2輯(北京，2018.06)，頁168-189。

⁷⁸ 石韞玉鑒定，顧沅輯，《元妙觀志》，卷7，頁698a。另外關於彭啟豐與道教的關係可參考黃新華，〈彭啟豐與道教關係初探〉，《常熟理工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第3期(蘇州，2016.05)，頁72-73。Daniel Burton-Rose, "A Prolific Spirit: Peng Dingqiu's Posthumous Career on the Spirit Altar, 1720-1906," *Daoism: Religion, History and Society*, no.7(2015):7-62.

⁷⁹ 徐世昌輯，《晚晴簃詩匯》，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633冊，卷193，頁601a。關於惠遠謨的研究還可以參考黃新華，〈清朝道士惠遠謨事跡考〉，《弘道》，第3期(香港，2014.09)，頁45-52。

⁸⁰ 石韞玉鑒定，顧沅輯，《元妙觀志》，卷10，頁712b-713a。

會中成員。⁸¹從傳記看，蔡維熊並無官職，但他的兒子蔡以臺卻是乾隆二十二年(1757)狀元，官授翰林院修撰，蔡維熊父憑子貴。蔡以臺，字季實，號蘭圃，乾隆二十二年會試、殿試皆第一，官授翰林院修撰，充日講起居注官，著有《姓氏竊略》六卷、《三友齋遺稿》等作品。⁸²與上文提到的程鍾彥一樣，蔡以臺也是婁近垣的「法弟子」，婁近垣在大上清宮建造的大上清宮祠堂，其〈上清宮祠堂碑文〉就是由他書寫的。⁸³

在《晚晴移詩匯》卷八十八中收錄了兩首蔡以臺的詩，一首是〈寄周青在〉，另一首就是〈光明殿寓齋應慎郡王教〉⁸⁴，而「光明殿」正是清世宗雍正賜予婁近垣的道觀，「慎郡王」即曾為婁近垣作詩、寫碑的多羅慎郡王允禧。蔡以臺的老師董邦達也與婁近垣有交往。董邦達，字孚寸，浙江富陽(今浙江省杭州市富陽區)人，是清代的官員、書畫家，⁸⁵沈德潛為婁近垣撰寫的〈妙緣觀碑〉就是由董邦達篆額，⁸⁶前文提到的由蔡以臺書寫的〈上清宮祠堂碑文〉也是由董邦達篆刻。

董邦達還曾參與《西清古鑑》的編修，這是一部著錄清代宮廷所藏古代青銅器的圖譜錄。乾隆十四年(1749)，乾隆皇帝下旨，命吏部尚書梁詩正、戶部尚書蔣溥、工部尚書汪由敦率翰林仿宋宣和年編制的《博古圖》樣式，收

⁸¹ 許王猷，字賓穆，號竹君，康熙五十二年(1713)中進士，官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清末朱汝珍輯，《詞林輯略》，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學林類》(臺北：明文書局印行，1985)第18冊，卷2，頁99。

⁸² 曹相駿纂，許光墉增纂，《重輯楓涇小志》，卷5，頁86a。阮元輯，《兩浙輶軒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684冊，卷29，頁177b-178a。清高宗勅撰，《清朝文獻通考》(臺北：新興書局，1963)，卷52，頁5349。

⁸³ 婁近垣重輯，惠遠謀校，《龍虎山志》(道光十二年增補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編號「線普415215-220」)，卷12，〈上清宮祠堂碑文〉，頁32-33。這是上海圖書館收藏的另一本《龍虎山志》，其中收錄的〈上清宮祠堂碑文〉並未見於其他版本，因此特別註明。

⁸⁴ 〈光明殿寓齋應慎郡王教〉：「左右鄒枚幕裏賓，樗材也許奉清塵。棋敲暖玉甘饒子，詩效寒郊肯讓人。兔魄乍虧三日照，桃花依舊十分春。選樓閒處多閒暇，倩問朝天酒幾巡。」徐世昌輯，《晚晴移詩匯》，卷88，頁59a。

⁸⁵ 董邦達，雍正元年(1723)選拔貢生，任戶部京官。雍正十一年(1733)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乾隆三年(1738)，充陝西鄉試考官。後來又歷任右中允、侍讀學士、左都御史、工部尚書、禮部尚書等官職。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305，頁10518。

⁸⁶ 沈德潛撰，允禧正書，董邦達篆額，〈妙緣觀碑〉，頁74。

錄內務府所藏鼎、尊、彝等青銅器匯輯成編。上文提及的幾個人物，如裘曰修、于敏中、董邦達和陳孝泳都參與了編纂。主編梁詩正，字養仲，浙江錢塘人，⁸⁷梁詩正給婁近垣作詩賀壽，而他的兒子梁同書是婁近垣的法弟子。梁同書，字元穎，號山舟，乾隆十二年(1747)舉人，乾隆十七年(1752)賜進士，改庶吉士，授編修。⁸⁸

倪國璉，字子珍，仁和人，雍正八年(1730)進士，累官吏科給事中。倪國璉之子倪承寬，字虞疆，乾隆十九年(1754)一甲進士，官至太常寺卿。倪國璉與倪承寬都以詩文、書法著稱一時。⁸⁹

另一位法弟子莊培因與倪承寬是同年進士，倪承寬是探花，而莊培因是狀元。莊培因，字本淳，江蘇陽湖人。⁹⁰莊培因的父親莊柱，字書石，號南村，雍正五年(1727)中進士，官浙江海防兵備道。莊柱與彭啟豐是同年進士，兩人相交甚厚，彭啟豐曾為莊柱作墓誌銘。⁹¹另外，莊柱與彭啟豐還有姻親關係，彭啟豐的長女嫁給了莊柱之子莊培因。⁹²

以上梳理這些人物關係可以發現，與婁近垣交往的官員上至親王、郡王、一品尚書、二品侍郎，下至四品侍講學士、五品給事中，不乏達官顯貴，婁近垣接觸到王朝最有權勢的一群人。一方面，這些官員當中既有親張廷玉一系也有親鄂爾泰一系，婁近垣在這些關係中平衡自己的權力；另一方面，這些官員大多出身江浙，與婁近垣籍貫相近、有同鄉情誼。婁近垣社交網絡中的這些人物基於同年、同僚、同鄉、師生和姻親等關係形成了錯綜複雜的社交網絡，這個顯赫而複雜的關係網也為婁近垣在京城活動提供了作為空間。

⁸⁷ 梁詩正，雍正八年(1730)中進士及第，授編修，累遷侍講學士。乾隆即位之後，召南書房行走，後補侍讀學士，又歷任戶部侍郎、兵部尚書、吏部尚書等職。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卷303，頁10490-10492。

⁸⁸ 徐世昌輯，《晚晴簃詩匯》，卷81，頁662b。

⁸⁹ 鄭澧修，邵晉涵纂，乾隆《杭州府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701-703冊，卷94，頁419b。

⁹⁰ 莊培因，乾隆十三年(1748)九月由內閣中書入值，乾隆十九年(1754)狀元，官至翰林院侍講學士。梁章鉅、朱智撰，何英芳點校，《樞垣記略》，收入《清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4)，卷18，頁199。

⁹¹ 彭啟豐，《芝庭先生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96冊，卷13，〈中憲大夫浙江海防兵備道莊君墓誌銘〉，頁573a-575a。

⁹² 彭啟豐，《芝庭先生集》，卷17，〈亡妻宋夫人述〉，頁623a。

之前已有學者研究過「京官」這一官僚群體的為官狀態，很多京官出身科甲，他們大多來自外省，往往借助各種媒介與在京同鄉發生往來，交換有關朝廷動向的各類信息和政治資源，謀求政治、經濟和生活上的利益，從而形成了複雜關係的社交網絡。⁹³以婁近垣為切入點的這個關係網絡中也可以發現這樣的情況，交友圈中的這些人物基於同年、同僚、同鄉、師生和姻親等複雜關係相互連接起來，甚至不同政派的官員也有錯綜曲折的關聯。

除了這些在京官員，還有一位多以文名著稱的江南籍官員鄭板橋也與婁近垣有密切交往。鄭板橋(1693-1765)，原名鄭燮，字克柔，江蘇興化(今江蘇省興化市)人。乾隆元年(1736)中進士，歷任山東范縣知縣和濰縣知縣等官職。他性格落拓不羈，「喜與禪宗尊宿及期門羽林弟子游」。⁹⁴已經有學者考證過他與婁近垣的交往，在《板橋集》中收錄了〈宿光明殿贈婁真人諱近垣〉和〈為婁真人畫蘭〉兩首詩，以此看出鄭板橋入京時曾住在大光明殿內。⁹⁵

除此之外，鄭板橋與婁近垣的弟子施遠恩、程鐸也有交往。施遠恩，字魯瞻，法名冲暉，號兩山，仁和(今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人。生於康熙三十八年(1699)，比婁近垣小十一歲，他十歲即跟隨族叔出家吳山長生房，雍正十年(1732)入京師大光明殿，跟隨婁近垣修道。雍正十三年(1735)，授龍虎山大上清宮協理提點。⁹⁶直到乾隆十二年(1747)，施遠恩離開龍虎山回到杭州。乾隆三十二年(1767)十一月二十日，戌時羽化，年六十有九。⁹⁷施遠恩來自杭州，他本身工於詩詞，在《龍虎山志》的卷十三〈藝文〉中也收錄了他的八首詩，

⁹³ 劉鳳雲，〈從清代京官的資歷、能力和俸祿看官場中的潛規則〉，《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第6期(北京，2008.11)，頁143-150。張一馳，〈京官社交網絡與盛清政治——以乾隆初年許王猷、仲永檀系列事件為例〉，《史學月刊》，第6期(開封，2017.06)，頁57-66。

⁹⁴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卷72，頁5882-5883。

⁹⁵ 羅文華，〈清代高道婁近垣事跡考述〉，頁320-321。鄭燮撰，《板橋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273冊，「板橋詩鈔」，頁633a、687b。

⁹⁶ 鄭灃修，邵晉涵纂，乾隆《杭州府志》，卷108，頁674b。文中說施遠恩於雍正十年入京師大光明殿跟隨婁近垣修道，與婁近垣住持大光明殿時間(雍正十一年)略有出入。

⁹⁷ 盧菘修，朱朗齋等纂，《吳山城隍廟志》，收入《中國道觀志叢刊》，第19冊，頁352-353。

如《龍虎山早秋》、《龍虎山即事》和《雷壇春望》等。⁹⁸施遠恩除了自身創作之外，也與當時的文人有廣泛交游。《晚晴簃詩匯》中記載，他從大光明殿回鄉之後，「與鄭板橋、侯夷門、厲樊榭、杭大宗、吳西林諸名流酬唱」。⁹⁹

鄭板橋與程鐸的交往見於他曾為程鐸畫蘭草長卷一幅，程鐸於長卷題識，「王戎載(乾隆七年，1742，筆者註)陽月吉，板橋老先生留宿光明寓齋，適值蘭草盛開，小酌興發，圖此長卷，并題見贈，即席依韻稱謝，兼祈教正」。¹⁰⁰

(三)內官太監

除了宗室成員、當朝官員和文人墨客，婁近垣的交往對象還包括內官太監，這是婁近垣為宮廷舉辦道場的緣故。通常認為清朝皇室信仰薩滿教與藏傳佛教，除雍正皇帝之外對道教無甚興趣，但經過學者考證，清朝宮廷一直有任用道士從事祭祀活動的記載，在皇城與內城中主要有欽安殿、天穹寶殿、大光明殿和大高玄殿四座道教場所，從事道教活動的人員有宮廷道士、太監道士和北京住廟道士三類。¹⁰¹宮廷道士也就是值季法官，通常是由龍虎山派至京城專門為皇帝舉行道教活動的道士，婁近垣就是這樣的宮廷道士，而太監道士則是由內官太監臨時充當的儀式人員。

前文提及，雍正八年婁近垣受命為雍正設壇禮斗驅邪，當時雍正下令在紫禁城御花園建立了四座斗壇神祠，雍正還專門從圓明園佛樓中分撥出十名道童在斗壇應差，又委派二十八名太監專門負責在斗壇供奉香燭、培澆花樹、

⁹⁸ 婁近垣重輯，惠遠謨校，《龍虎山志》(乾隆五年首刊本)，卷13，頁51b-53a。

⁹⁹ 徐世昌輯，《晚晴簃詩匯》，卷193，頁602a。杭大宗即杭世駿，號堇浦，浙江仁和人，雍正元年舉人，乾隆元年召試，官翰林院編修。張維屏輯，《國朝詩人徵略》，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1712冊，卷24，頁537b。

¹⁰⁰ 其他鄭板橋與道士交往的信息參金實秋，《鄭板橋與佛教禪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頁46-48，51-52。鄭燮著，劉光乾、郭振英撰，《鄭板橋文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頁114、238。劉中建、林存陽，《鄭板橋的「狂」、「怪」人生》(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頁76。卞孝宜，《鄭板橋叢考》(沈陽：遼海出版社，2003)，頁39-40，76-77。鄭燮著，吳澤順編註，《鄭板橋》(長沙：嶽麓書社，2002)，頁337-338。轉引自：羅文華，《清代高道婁近垣事跡考述》，頁320-321。

¹⁰¹ Vincent Goossaert, "The Taoist of Peking, 1800-1949: A Society History of Urban Clerics," 188-235.

飼養仙鶴池魚，以及灑掃坐更等事。除此之外，婁近垣擔任紫禁城內廷欽安殿住持、京師大光明殿住持、東嶽廟等處正住持，在為皇家舉行祭祀儀式的過程中也需要與太監道士合作。

以欽安殿為例，欽安殿位於紫禁城內部，是專門為皇家舉行祈福、誦經和升舉等道場的道觀。每逢年節均舉辦道場，宮殿監率該處首領太監於欽安殿、天一門內正中設斗香恭候皇帝親詣拈香行禮。每月朔望也要在欽安殿和天一門內設斗香，則由宮殿監等拈香行禮。¹⁰²直至道光十九年(1839)，諭旨停止在欽安殿按例興辦祭祀道場，但仍然保留了日常供獻上香和灑掃等事，從《大清宣宗成皇帝實錄》中可以看到欽安殿興辦道場的情況。(道光十九年十一月，筆者註)諭內務府大臣等：

向來欽安殿當差之首領太監等，每年正月、二月、八月、九月、十月、十二月均有辦道場之期，每月又有拜斗之日。朕思該太監等供役內庭，原為灑掃殿宇差使，嗣後該處首領太監在欽安殿辦道場及拜斗等事著永遠停止。……所有欽安殿首領太監等應用之道衣、法器、經卷，著派敬徵率同總管太監劉進禮前往查明。……嗣後每屆欽安殿、天穹寶殿、斗壇及圓明園佛樓等處拜斗拈香日期，著敬事房圓明園司房先期請旨，並著總管太監等傳諭各該處首領太監，此後照常供獻上香，敬謹灑掃，著為令。¹⁰³

根據這些記錄可以發現，婁近垣在內廷舉辦道場，主要由各宮殿太監參與，如首領太監、總管太監等都是等級比較高的內官。清朝統治者認識到明朝宦官干預朝政所造成的嚴重惡果，因此對太監管理非常嚴格，除了制定一系列條例規範太監的日常活動，還嚴禁太監干預朝政，更不准太監與大臣們交往。雍正三年(1725)十二月，打掃處太監傅國相，曾因向奏事處太監劉裕探聽廢官開復事，受到了嚴厲的治罪處分。乾隆十年(1745)十一月，四執事太監趙起龍也因與大臣慶復之子交往、議論皇帝活動情況被治罪。乾隆在上諭中重申，

¹⁰² 王子林，〈欽安殿綜述〉，《故宮學刊》，第1期(北京，2014.05)，頁238-259。

¹⁰³ 《大清宣宗成皇帝實錄》，收入《清實錄》，第37冊，卷328，頁1155-1156。

「太監等不許與王公大臣往來交往，王公大臣有事必定入奏，凡有情弊，經朕察知，爾等焉能免罪」。¹⁰⁴

制定這一系列條例制度嚴禁太監與王公大臣來往，也是為了防止太監干預朝政，但是前文已經提及，內廷太監中有一部分道士太監，負責參與在內廷舉辦的道教科儀，所以婁近垣在主持法事的過程中就可以與這些高等級內官有近距離接觸，而且他的道士身份也不同于朝廷外官那般敏感。除了共同在內廷舉辦道場，在同時期的東嶽廟祭祀中也可以發現婁近垣與內官之間的聯繫。

明清時期，東嶽廟祭祀被列入國家典制，每年三月二十八日東嶽大帝誕辰日舉行東嶽大帝出巡的盛大慶典。¹⁰⁵東嶽廟不僅承擔皇家祭祀的職責，也受到民間崇奉，每月朔望東嶽廟都有隆重的祭祀活動，由不同地區、不同職業和團體組成的各種各樣的香會前來進香、參拜，如獻花聖會、白紙老會、供茶老會、魯班聖會、揮塵會和淨爐會等等。¹⁰⁶從明後期開始，東嶽廟出現了好幾通以「會」的名義立的碑，而且大多數與宮廷人士、特別是與內官的活動有關，如萬曆十三年(1585)三月立《東嶽廟供奉香火義會碑記》、天啟七年(1627)三月立《東嶽天齊大生仁元玄聖帝白紙聖會碑記》和崇禎五年(1632)三月立《東嶽廟常明海燈聖會碑》等，立這些碑的「會」都主要由太監及宮女組成。¹⁰⁷

由明入清以後，由宦官所立會碑、由高官顯貴撰文題字的會碑大大減少，而一般民間香會的立碑明顯增多。¹⁰⁸儘管出現了越來越多其他行業和人員組成的會，但仍然有主要由宦官組成的會，例如乾隆二年(1737)六月一日，楊汝谷撰，白紙老會領善弟子李元龍、李景賢等立《東嶽白紙老會碑記》，側題

¹⁰⁴ 王樹卿，〈清朝太監制度〉，《故宮博物院院刊》，第2期(北京，1984.06)，頁3-12。王樹卿，〈清朝太監制度(續)〉，《故宮博物院院刊》，第3期(北京，1984.09)，頁58-68。

¹⁰⁵ 林巧薇，〈北京東嶽廟與明清國家祭祀關係探研〉，《世界宗教研究》，第5期(北京，2014.10)，頁61-71。

¹⁰⁶ 袁冰凌，〈北京東嶽廟香會〉，《法國漢學》，第7輯(北京，2002.12)，頁397-426。

¹⁰⁷ 袁冰凌，〈北京東嶽廟碑文考述〉，《三教文獻》，第3期(巴黎，1999)，頁137-158。

¹⁰⁸ 趙世瑜，〈國家正祀與民間信仰的互動——以明清京師的「頂」與東嶽廟為個案〉，《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6期(北京，1998.11)，頁22。

「天壇進貢東嶽散司白紙簿籍老會」，碑陰題名乾清宮總管劉玉、陳福等會眾約七百，再如乾隆六年(1741)三月，道士婁近垣撰、獻花會立《東嶽廟獻花勝會碑記》，碑陰題名「正會首內六品官」，及乾清宮、寧壽宮、壽康宮、雍和宮和圓明園等處首領太監和總管太監等八十人之多，以及乾隆二十一年(1756)八月，婁近垣撰並書《東嶽廟獻花勝會碑記》，根據碑文中「總管劉玉等復相約捐資」和碑陰名錄中「乾清宮眾善人等」可知其成員也多為太監。¹⁰⁹

後面兩通碑都是由婁近垣撰寫，我們目前共發現了三通婁近垣為東嶽廟香會撰寫的碑刻，一通是為「淨爐會」所寫，另外兩通均是為「獻花勝會」撰寫。婁近垣作為東嶽廟正住持兼掌管道錄司印務事為內官太監撰寫香會碑記，一方面出於對「獻花勝會」的重視，另一方面也說明這些首領太監和總管太監地位頗高，並且極可能參與內廷欽安殿道場，從而與婁近垣相識。

第一通《東嶽廟獻花勝會碑記》刻於乾隆六年(1741)三月，碑陰記錄了參與香會的成員，包括「正會首內六品官」，及乾清宮、寧壽宮、壽康宮、雍和宮和圓明園等處首領太監和總管太監等八十人之多，以及「等□太監、首領張□」開頭的三百多人(不包括殘碑)，也很可能是宮內各處太監。落款「敕封妙正真人、誥授通議大夫、供奉欽安殿、掌道錄司印務、攝東嶽廟正住持、提點龍虎山大上清宮、領道教事婁近垣撰」，這裡羅列了婁近垣的所有封號和職務。

是碑由「實錄館校錄官、前次議敘例授儒林郎、即用州同知、仍留本館充校錄官張繼齡」書寫，「賜進士出身、例授奉政大夫、禮科給事中、前都察院御史、翰林院編修程鍾彥」篆額，書寫人和篆額人的身份也反映出香會成員的重要性，而這位篆額人程鍾彥正是上文提到的婁近垣的法弟子之一，既是他的同鄉，也是一名江南籍京官。

第二通《東嶽廟獻花勝會碑記》，刻於乾隆二十一年(1756)八月，文中提到「總管劉玉等復相約捐資，剪緞□木為供具，視事益虔」，碑陰題名「乾清宮眾善人等，總管超成、李良、李文貴、郭明義、王成、潘鳳、陳福、劉

¹⁰⁹ 東嶽廟北京民俗博物館編，趙世瑜主持輯錄並審定，《北京東嶽廟和北京泰山信仰碑刻輯錄》(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2004)，頁148-149、153-154、168-170。

玉、魏珠、劉蒼州、曹進孝、曹進孝、¹¹⁰孫進朝、李裕、張國祥、王□貴」等以及之後四百多人，也很可能是「乾清宮」內太監。

明清以來，宦官通過寺廟與民間社會發生密切聯繫。一方面，他們親自出資建廟修廟，也同地方精英聯合建廟；另一方面，宦官組成大量香會組織參與到民間祭祀活動中，有的是專門由宦官組成的香會組織，有的是與民眾共同組成的民間組織，甚至宦官在這些組織中擔任首領。儘管由明入清以後，這種情況有所減少，但這依然是宦官與民間社會發生密切聯繫的重要方式。¹¹¹同時，宦官也企圖通過與寺廟發生聯繫，從而獲得養老生活保障及死後的安葬和祭祀，比如清代太監組織的養老義會。對於寺廟來說，這些內官太監也為他們舉辦齋醮活動提供贊助，是一部分重要的經濟來源。¹¹²在宮廷中「充道士」的內官太監在紫禁城內協助婁近垣舉辦宮廷道場，在東嶽廟香會上組織香會參與民間祭祀，作為東嶽廟正住持的婁近垣也為他們參與香會撰寫碑文，同時，東嶽廟作為官方道觀承辦宮廷齋醮，東嶽廟內的道士也「入宮當差」，三方均有密切往來。

三、結語

反思婁近垣顯赫的社交網絡，他作為一名道士，在信奉藏傳佛教的皇室內部以及推崇儒家治國的政治氛圍中，與王公貴族和當朝官員相交往來，還有不少官員成為他的「法弟子」，承兩朝榮寵且活躍如此之久，除去他精通道法和個人魅力的可能之外，他所涉及的政治利益恐怕也是不能忽視的因素。婁近垣與王公貴族、當朝官員、文人墨客和內官太監等不同的群體保持密切聯繫，儘管我們目前還沒有發現更多材料來證明婁近垣實際參與了當時的政治鬥

¹¹⁰ 原文中有兩位「曹進孝」。

¹¹¹ 趙世瑜，〈黑山會的故事：明清宦官政治與民間社會〉，收入趙世瑜著，《狂歡與日常：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頁 297-301。

¹¹² Vincent Goossaert, "The Taoist of Peking, 1800-1949: A Society History of Urban Clerics," 216-218; 張雪松，〈清代以來的太監廟探析〉，《清史研究》，第 4 期（北京，2009.11），頁 90-91。

爭，但這個交遊網絡無疑為婁近垣穩固自身的政治地位和促進他所涉及的龍虎山正一道派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

前文已經提到，相比雍正對婁近垣的寵信，乾隆皇帝對道教的態度有很大轉變，他繼位之後立刻驅逐了張太虛和王定乾等在宮內煉丹的道士。婁近垣在這場政權更迭中不僅未受影響，反而得到了敕封。雍正十三年九月初三日，清高宗乾隆覃恩授婁近垣通議大夫，食三品俸，并追贈祖父母、父母誥命。祖父婁榮贈通議大夫，祖母盛氏贈淑人，繼祖母許氏、顧氏、朱氏俱贈淑人。父婁明聘贈通議大夫，母孫氏贈淑人。¹¹³次年七月，乾隆又諭旨，「妙正真人婁近垣帶管道錄司印務、東嶽廟住持，餘如故」。¹¹⁴也就是說，婁近垣除了繼續任龍虎山大上清宮提點和內廷欽安殿住持之外，還同時擔任京城兩大道觀大光明殿和東嶽廟住持，承辦內廷齋醮道場，並且掌管國家道教管理機構道錄司，成為當時最有權勢的正一派道士之一。直至乾隆四十一年(1776)羽化，他在京城近五十年的時間裡都一直保持了這樣的地位，並且在相當一段時間裡其品秩甚至高過當時的正一真人。

乾隆七年(1742)九月，五十六代天師張遇隆襲爵，因此入京覲見謝恩，并請求隨班朝賀，這遭到了鴻臚寺卿梅穀成的反對，他上奏稱道家之流不宜與臣工為伍。最終乾隆同意了梅穀成的議奏，此後天師襲爵由禮部帶領引見，三年一次入覲並賜宴，且不與百官同列。¹¹⁵乾隆十二年(1747)十二月，副都御史梅穀成又上奏，清朝沿習明朝舊例，正一真人秩視二品，但正一真人類於「巫史方外」，不應品秩過高，亦不宜與諸臣同列。經大學士等議覆，正一人品秩由二品降為五品，與太醫院院使品秩相同，並禁止正一真人與朝臣同列朝賀。¹¹⁶原本大上清宮提點和道錄司左正一的品秩都是正六品，正一人品秩無論是二品還是五品，都優於前兩者。但由於清世宗在雍正九年(1731)將大上清宮提點婁近垣的品秩提高到四品，這樣一來，正一人品秩由二品降為五品之後，反而處於婁近垣品秩之下。這種情況直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

¹¹³ 婁近垣重輯，惠遠謨校，《龍虎山志》(乾隆五年首刊本)，卷1，頁8a-12b。

¹¹⁴ 婁近垣重輯，惠遠謨校，《龍虎山志》(乾隆五年首刊本)，卷8，頁6a。

¹¹⁵ 《高宗純皇帝實錄(三)》，收入《清實錄》，第11冊，卷174，頁235a。

¹¹⁶ 《高宗純皇帝實錄(四)》，收入《清實錄》，第12冊，卷304，頁981。

正一真人的品秩獲提為三品之後才有所改變。¹¹⁷也就是說，從乾隆十二年到乾隆三十一年(1747-1766)的這近二十年裡，正一真人的品秩一直沒有高過婁近垣。這無疑是對天師地位的貶低，同時也降低了天師對京城各道觀和道錄司的影響力，那麼婁近垣得以繼續掌控京城道教。

除了對京城道教的掌控，婁近垣在龍虎山大上清宮也保持影響力。五十五代天師張錫麟羽化之後，指派其二弟張慶麟接任署理真人，但四年之後，三弟張昭麟忽然替代張慶麟成為新的署理真人，而《龍虎山志》中沒有記載這次人事變更的原因。細谷良夫首先梳理了雍正時期朝廷對龍虎山的賞賜，發現所有封賞均發生在婁近垣受寵之後，又從《宮中檔雍正朝奏摺》中查找到婁近垣、張昭麟二人與張慶麟的訴訟記錄，以及對張慶麟的處罰檔案，由此推測婁近垣參與了張慶麟和張昭麟圍繞署理真人位的鬥爭。作者認為，「龍虎山正一教」並不是一個在天師領導下的「強固結合的組織」，相反，圍繞張天師的嫡、庶子傳承，皇帝、天師與法官的關係，以及江西省地方官的干預等問題，在大上清宮法官和真人府之間存在著內部鬥爭。¹¹⁸高萬桑也認為，隨著婁近垣地位日益顯赫與張天師的爵秩降級，婁近垣成為龍虎山的實際領導者，其中一個表現就是他創立了一個新的道派，甚至整個龍虎山法官都成為婁近垣法裔。¹¹⁹

婁近垣在他重輯編修的《龍虎山志》中記錄了他創立的這個新的道派，其派詩為「近遠資元運，久長保巨淳。道惟誠可寶，德用信為珍。秉敬宏丹籙，葆真啟世人。鴻圖贊景祚，聖澤振昌辰。」¹²⁰我們發現，婁近垣將這個法派帶到北京，並且直到民國時期仍有傳承。前文已經提到，乾隆十一年(1746)，和碩莊親王將北京妙緣觀交與婁近垣掌管並倡捐修葺，沈德潛還為妙緣觀撰寫了碑文。乾隆四十一年(1776)，八十九歲的婁近垣移居到這裡並在此羽化。直到民國二十五年(1936)和民國三十六年(1947)，北平市政府登記寺廟信息的時候，妙緣觀還有道士居住。

¹¹⁷ 《高宗純皇帝實錄(一〇)》，收入《清實錄》，第18冊，卷760，頁365b。

¹¹⁸ 細谷良夫著，張澤洪譯，〈雍正朝的正一教——以法官婁近垣為中心〉，頁17-18。

¹¹⁹ Vincent Goossaert, "Bureaucratic Charisma: The Zhang Heavenly Master Institution and Court Taoist in Late-Qing China," 145-146.

¹²⁰ 婁近垣重輯，惠遠謨校，《龍虎山志》(乾隆五年首刊本)，卷3，頁9a。

妙緣觀(道廟)坐落內五區大石橋二十三號，建於明景泰年，屬公建。不動產土地約八畝，房屋四十一間。管理及使用狀況為正殿供神，餘房租賃。廟內法物有神像三十八尊，禮樂器十九件，供桌五張，另有大小樹二十株，水井一眼。¹²¹

其中，「1947年北平市政府第二次寺廟總登記」中還記錄當時的住持為單純一，¹²²另外在《北平市民政局·北平市寺廟總登記簿》中記載，從清光緒十四年(1888)到民國二十五年(1936)，該觀共有三位道長前後相繼住持道觀，分別是黃保壽、劉巨銑和單純一。而且民國二十五年(1936)的調查顯示，當時妙緣觀佔地約八畝，觀內房屋尚有四十一間，主要供奉斗母、玉皇和呂祖等，房舍多破敗，部分大殿被用作染坊，其餘房屋出租，但香火未絕。民國三十五年(1946)，住持單純一因病回原籍(浙江紹興)休養，曾將廟務交給單寶石經管。¹²³從這些住持的名字上看，「保」、「巨」、「純」(與「淳」同音)、「寶」(與「保」同音)符合婁近垣法派的派詩「久長保巨淳」，這說明直到上世紀五十年代，婁近垣創立的大上清宮法派一直在北京妙緣觀傳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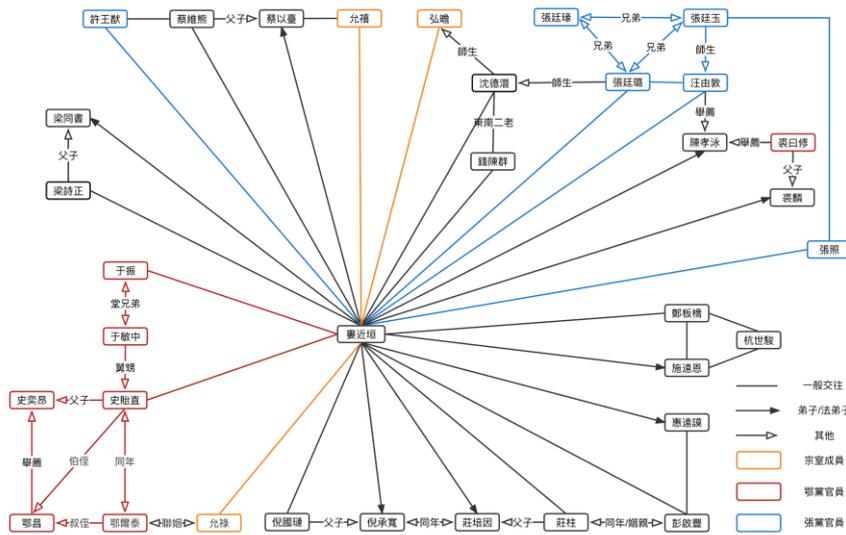
綜上，我們主要通過兩份賀壽人員名單以點到面，逐步探索了婁近垣在京城社交網絡，他作為一名宮廷道士為宗室提供道教儀式服務，同時活躍在京師這個政治權力中心近五十年的時間，他的交遊人群涵蓋了王公貴族、當朝官員、文人墨客和內官太監等不同的群體，而這些人物之間也基於同年、同僚、同鄉、師生和姻親等關係相互連接，形成了錯綜複雜的社交網絡。這個顯赫而複雜的關係網為婁近垣在京城活動提供了作為空間，不僅鞏固了他自身的地位，而且促進了龍虎山正一道派在北京的傳播。由此，我們也可以

¹²¹ 北京市檔案館編，《北京寺廟歷史資料》(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1936年北平市政府第一次寺廟總登記」，頁587。

¹²² 北京市檔案館編，《北京寺廟歷史資料》，「1947年北平市政府第二次寺廟總登記」，頁686。

¹²³ 北京市檔案館藏，《北平市民政局·北平市寺廟總登記簿》，檔案號J3-1-203。北京市檔案館藏，《北平市社會局寺廟類·內五區妙緣觀道士單純一登記廟產發放憑照的呈文及社會局的批示》，檔案號J181-15-344。北京市檔案館藏，《北平市民政局·北平市第五區妙緣觀住持單純一呈送登記表及第五區的調查報告》，檔案號J3-1-166。轉引自：董曉萍、呂敏(Marianne Bujard)主編，《北京內城寺廟碑刻志》(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卷1，頁183。

看到宮廷道士在承辦齋醮道場之餘的個人社交，以及官員士大夫、文人墨客、內官太監與道士交往的業餘生活，以此作為了解當時道教發展狀況的補充。最後，我們嘗試繪製出婁近垣的社交網絡圖以供參考，並將現有資料顯示的明確的「鄂黨」與「張黨」官員、以及宗室成員用不同顏色表示以示區分，參附圖。



附圖一、婁近垣社交網絡圖

徵引書目

Bibliography

(一) 傳統文獻

- 丁兆基等修，汪國鳳等纂，《金壇縣志》，清光緒十一年活字本，收入《中國數字方志庫》。
- 內務府編，《欽定總管內務府現行則例二種》，收入《故宮珍本叢刊》，第 307 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 文慶等修，《清實錄·宣宗成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 王鍾翰點校，《清史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87。
- 北京市檔案館編，《北京寺廟歷史資料》，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
- 北京市檔案館藏，《北平市民政局·北平市寺廟總登記簿》，檔案號 J3-1-203。
- 北京市檔案館藏，《北平市民政局·北平市第五區妙緣觀住持單純一呈送登記表及第五區的調查報告》，檔案號 J3-1-166。
- 北京市檔案館藏，《北平市社會局寺廟類·內五區妙緣觀道士單純一登記廟產發放憑照的呈文及社會局的批示》，檔案號 J181-15-344。
- 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1991。
- 石韞玉鑒定，顧沅輯，《元妙觀志》，收入《三洞拾遺》，第 15 冊，合肥：黃山書社，2005。
- 佚名，《皇清奏議》，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47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宋如林修，孫星衍、莫晉纂，嘉慶《松江府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上海府縣志》，第 2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成都：巴蜀書社聯合出版，1991。
- 沈德潛撰，允禧正書，董邦達篆額，〈妙緣觀碑〉，收入《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第 71 冊，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1991。
- 阮元輯，《兩浙輶軒錄》，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68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昭槤撰，何英芳點校，《嘯亭雜錄》，收入《清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0。
- 胡道靜等編，《藏外道書》，第 17 冊，成都：巴蜀書社，1992-1994。

- 徐世昌輯，《晚晴簃詩匯》，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63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婁近垣重輯，惠遠謨校，《龍虎山志》，乾隆五年首刊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1740。
- 婁近垣重輯，惠遠謨校，《龍虎山志》，道光十二年增補本，上海：上海圖書館藏，1832。
- 婁近垣重輯，惠遠謨校，舒運本增補，《龍虎山志》，道光十二年增補本，收入《三洞拾遺》，第 13 冊，合肥：黃山書社，2005。
- 婁近垣重輯，惠遠謨校，舒運本增補，《龍虎山志》，道光十二年增補本，收入《中國道觀志叢刊》，第 25、26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 婁近垣增訂，《太極靈寶祭煉科儀》，清乾隆三十二年刻本，南京：南京圖書館藏，1767。
- 張昭麟撰，張照正書，程鍾彥篆額，焦國華鐫，〈大真人府碑〉，收入北京圖書館金石組編，第 69 冊，《北京圖書館藏中國歷代石刻拓本匯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1991。
- 張維屏輯，《國朝詩人徵略》，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71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曹相駿纂，許光墉增纂，《重輯楓涇小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鄉鎮志專輯》，第 2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成都：巴蜀書社聯合出版，1991。
- 梁章鉅、朱智撰，何英芳點校，《樞垣記略》，收入《清代史料筆記叢刊》，北京：中華書局，1984。
- 梁詩正、蔣溥等奉勅編，《西清古鑑》，清乾隆內務府刊本，劍橋：哈佛燕京圖書館藏，1755。
- 清末朱汝珍輯，《詞林輯略》，收入周駿富輯，《清代傳記叢刊·學林類》，第 18 冊，臺北：明文書局印行，1985。
- 清高宗勅撰，《清朝文獻通考》，臺北：新興書局，1963。
- 許瑤光修，吳仰賢纂，光緒《嘉興府志》，收入《中國地方志集成·浙江府縣志專輯》，第 13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上海：上海書店；成都：巴蜀書社聯合出版，1993。
- 陸錫熊撰，《寶奎堂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38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彭定求，《南畝文稿》，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6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彭啟豐，《芝庭先生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29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鄂爾泰、張廷玉等奉敕編纂，《國朝宮史》，收入《故宮珍本叢刊》，第 312 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
- 黃叔璥撰，戴璐等續補，《國朝御史題名》，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75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裘曰修撰，《裘文達公文集》，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44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清代起居注冊·雍正朝》，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5。
- 趙爾巽等撰，《清史稿》，北京：中華書局，1977。
- 劉錦藻撰，《清朝續文獻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據民國景十通本影印，2000。
- 慶桂等修，《清實錄·高宗純皇帝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5。
- 鄭澐修，邵晉涵纂，乾隆《杭州府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701-70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鄭燮撰，《板橋集》，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273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盧崧修，朱朗齋等纂，《吳山城隍廟志》，收入《中國道觀志叢刊》，第 19 冊，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

(二) 近人論著

-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編，《清史編年》，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1。
- 卞孝宜，《鄭板橋叢考》，沈陽：遼海出版社，2003。
- 孔祥毓，〈妙正真人婁近垣的生平著作及思想〉，《中國道教》，第 3 期(北京，2006.06)，頁 52-54。
- 尹志華，〈清朝宗室與道教〉，《宗教學研究》，第 4 期(成都，2017.12)，頁 59-65。
- 王子林，〈欽安殿綜述〉，《故宮學刊》，第 1 期(北京，2014.05)，頁 238-259。
- 王卡，〈清代天師道概述〉，《正一道教研究》，第 2 輯(上海，2013.10)，頁 2-31。

- 王見川，〈彭定求(1645-1719)與清初蘇州道教：扶鸞、禮斗與著書〉，收入《歷史、藝術與台灣人文論叢》，第10輯(臺北，2016.11)，頁85-106。
- 王見川，〈彭定求的扶鸞與著書——從其與清初著名道士施道淵的關係談起〉，《道教學刊》，第2輯(北京，2018.06)，頁168-189。
- 王樹卿，〈清朝太監制度(續)〉，《故宮博物院院刊》，第3期(北京，1984.09)，頁58-68。
- 王樹卿，〈清朝太監制度〉，《故宮博物院院刊》，第2期(北京，1984.06)，頁3-12。
- 史全生，〈關於史貽直兩則史料的考訂〉，《揚州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3期(揚州，2011.05)，頁89-93。
- 由申，〈清代道士婁近垣及其主要思想〉，《弘道》，第3期(香港，2012.09)，頁67-71。
- 朱家潛，〈《黃籙科儀》提要〉，《道協會刊》，第6期(北京，1980.11)，頁47-49。
- 李玉安、黃正兩編著，《中國藏書家通典》，香港：中國國際文化出版社，2005。
- 東嶽廟北京民俗博物館編，趙世瑜主持輯錄並審定，《北京東嶽廟和北京泰山信仰碑刻輯錄》，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2004。
- 林巧薇，〈北京東嶽廟與明清國家祭祀關係探研〉，《世界宗教研究》，第5期(北京，2014.10)，頁61-71。
- 金實秋，《鄭板橋與佛教禪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
- 徐凱，〈論雍乾樞要之臣張廷玉〉，《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期(北京，1992.07)，頁91-98。
- 袁冰凌，〈北京東嶽廟香會〉，《法國漢學》，第7輯(北京，2002.12)，頁397-426。
- 袁冰凌，〈北京東嶽廟碑文考述〉，《三教文獻》，第3期(巴黎，1999)，頁137-158。
- 張一馳，〈京官社交網絡與盛清政治——以乾隆初年許王猷、仲永檀系列事件為例〉，《史學月刊》，第6期(開封，2017.06)，頁57-66。
- 張昇，〈陸錫熊與《四庫全書》編修〉，《史學史研究》，第2期(北京，2014.06)，頁108-116。
- 張雪松，〈清代以來的太監廟探析〉，《清史研究》，第4期(北京，2009.11)，頁90-91。
- 梁繼，《張照年譜》，長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

- 細谷良夫，〈乾隆朝の正一教——正一真人の降格事件をめぐって〉，收入秋月觀暎編，《道教と宗教文化》，東京：平河出版社，1987。
- 細谷良夫著，張澤洪譯，〈雍正朝的正一教——以法官婁近垣為中心〉，《宗教學研究》，第 21 期(成都，1994.09)，頁 17-26。
- 陳雯宜，〈談妙正真人婁近垣——由清世宗的知遇至高宗的優禮〉，《道教學探索》，第 7 號(臺南，1993.12)，頁 295-313。
- 游子安，〈論清代江蘇長洲彭氏家學、善書與善舉〉，《大陸雜誌》，第 91 卷第 1 期(臺北，1995.07)，頁 34-44。
- 黃阿明，〈康熙十五年狀元彭定求生平史實述略〉，《歷史檔案》，第 4 期(北京，2013.11)，頁 80-86。
- 黃新華，〈清朝道士惠遠謨事跡考〉，《弘道》，第 3 期(香港，2014.09)，頁 45-52。
- 黃新華，〈彭啟豐與道教關係初探〉，《常熟理工學院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第 3 期(蘇州，2016.05)，頁 71-75。
- 楊啟樵，《雍正帝及其密摺制度研究》，香港：三聯書店，1985。
- 董曉萍、呂敏主編，《北京內城寺廟碑刻志》，卷 1，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
- 趙世瑜，〈國家正祀與民間信仰的互動——以明清京師的「頂」與東嶽廟為個案〉，《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6 期(北京，1998.11)，頁 18-26。
- 趙世瑜，〈黑山會的故事：明清宦官政治與民間社會〉，收入趙世瑜著，《狂歡與日常：明清以來的廟會與民間社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 劉中建、林存陽，《鄭板橋的「狂」、「怪」人生》，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2002。
- 劉鳳雲，〈從清代京官的資歷、能力和俸祿看官場中的潛規則〉，《中國人民大學學報》，第 6 期(北京，2008.11)，頁 143-150。
- 鄭燮著，吳澤順編註，《鄭板橋》，長沙：嶽麓書社，2002。
- 鄭燮著，劉光乾、郭振英撰，《鄭板橋文集》，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2。
- 黎志添，〈《先天斛食濟煉幽科》考〉，《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51 期(香港，2010.07)，頁 117-137。
- 賴惠敏，〈論乾隆朝初期之滿黨與漢黨〉，收入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與戴維斯加州大學歷史系合辦，《近世家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下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2。
- 韓曉梅，〈乾隆帝革去弘瞻親王爵位始末探析〉，《吉林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 3 期(四平，2019.05)，頁 21-27。

羅文華，〈清代高道婁近垣事跡考述〉，收入沈衛榮、謝繼勝主編，《賢者新宴——王堯先生八秩華誕藏學論文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0。

Burton-Rose, Daniel. "A Prolific Spirit: Peng Dingqiu's Posthumous Career on the Spirit Altar, 1720-1906," *Daoism: Religion, History and Society*, no.7(2015): 7-62.

Goossaert, Vincent. "Bureaucratic Charisma: The Zhang Heavenly Master Institution and Court Taoist in Late-Qing China," *Asia Major*, no.3(2004): 145-146.

Goossaert, Vincent. "The Taoists of Peking, 1800-1949: A Society History of Urban Clerics," Cambridge: MA. thesis,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7.

Naquin, Susan. *Peking: Temples and the City Life, 1400-1900*, Berkeley: University California Press, 2000.

(三) 網路資訊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明清檔案人名權威資料庫」：

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ttsweb/html_name/search.php

(2020/6/10 點閱)。

中國數字方志庫：

<http://x.wenjinguan.com/>

(2020/6/10 點閱)。

A Taoist Priest at the Qing Court: Lou Jinyuan and His Social Network

Gao, Li-juan

Postdoctoral Research Fellow,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Fudan University

Born in Songjiang Prefecture in Jiangnan area, Lou Jinyuan (1688-1776) was one of the most prestigious Taoist priests at the Qing court. He was called to Beijing in 1727 as a “Taoist officer” (faguan) to take charge of the liturgical affairs at the court after completing his religious training and cultivation at Longhu Shan in Jiangxi Province. During the Yongzheng and Qianlong periods, Lou had been appointed abbot of several important Taoist temples, including Qin'an Temple, Da Guangming Temple, and Dongyue Temple. He also headed the nationwide, state-controlled Taoist administration, “Daolusi”.

During his nearly 50-year stay in Beijing, Lou Jinyuan not only performed Taoist rituals for the imperial family, but also enjoyed an active secular life. As a court Taoist priest, he socialized with imperial noblemen and senior government officials. Together, they formed an intriguing network built upon complex social relations by marriage, or between colleagues, masters/disciples, and fellow native-place associates. Some eunuchs were also found active in Lou Jinyuan’s social circle. This article explores Lou’s social network and his secular life as an official Taoist priest serving at the court. By focusing on Lou’s social interactions with three groups of people: members of the royal clan, government officials

originally from the Jiangnan area, and palace eunuchs, it is hoped that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life of this remarkable court priest will be revealed.

Keywords: court Taoist priest, Lou Jinyuan, government official from Jiangnan, eunuch priest

